全球對話

10.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17種語言刊出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與 Alain Caillé 談社會學

Sari Hanafi

抗爭與社會運動

Ngai-Ling Sum
Michalis Lianos
Jorge Rojas Hernández
Gunhild Hansen-Rojas
Rima Majed

媒體與數位資本主義

Marlen van den Ecker
Marisol Sandoval
Sebastian Sevignani
Mark Andrejevic
Jack Linchuan Qiu
Tanner Mirrlees
Mandy Tröger

理論觀點

Francis Nyamnjoh

菲律賓社會學

Louie Benedict R. Ignacio
John Andrew G. Evangelista
Filomin C. Gutierrez
Phoebe Zoe Maria U. Sanchez

COVID-19：疫情與危機

Geoffrey Pleyers
Klaus Dörre
Sari Hanafi

議題開講

> 孟加拉的性別化都市空間
> 勞工國際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流動
> 葡萄牙面臨極右派的威脅

GD 第10卷 /第2期 / 2020.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主編的話

COVID-19的大爆發，正主導著世界許多國家的討論和發展。在全球北方跟全球南方國家之間，所謂的熱區（hotspots）或是鴻溝（gap）都顯示了社會不平等議題的重要性。不僅是衛生保健，更包括疫情後續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發展，都會成為關注的重點。在某些國家中，經濟危機構成了一段持續又嚴重的社會危機，而民主也受到限制性政策的威脅。在這期《全球對話》中，將考察一連串疫情對社會及社會學所帶來的學術意義，而我們也邀請了不同國家的學者來發表他們的看法。在正文開始之前，三位作者分享了他們對於新冠肺炎影響層面的看法。

在「社會學對話」這部分中，Sari Hanafi採訪了Alain Caillé，她是共生（convivialist）運動與宣言（manifesto）的聯合創始人之一。Caillé批評了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描述了共生主義（Convivialism）出現的開端，也說明共主義為何、如何作為一種「空能指」（empty signifier），將渴望於創造「後新自由主義」（post-neoliberal）世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

在前幾年中，我們經歷了許多針對反民主傾向、新自由主義發展、市場驅動的經濟影響、社會不平等的抗議。在許多地方，不論是新的社會運動或是新的抗議形式都已經慢慢出現，並挑戰了現有的政治體制。我們的第一部份的討論，包含Ngai-Ling Sum、Michalis Lianos、Jorge Rojas Hernández、Gunhild Hansen-Rojas和Rima Majed等人的學術分享，將闡明目前在香港、法國、智利、黎巴嫩及伊拉克的情況。

第二部分的討論將聚焦在媒體與傳播如何受利益所驅使，形塑我們的社會。這些文章由Marlen van den Ecker和Sebastian Sevignani兩位學者著筆，涵蓋了傳播的數位化及市場化中不同層面和其影響。從充當無償勞動者的社交媒體用戶、資本主義所有權中數據的功用、中國新數位勞工的積累，到媒體系統的重建，並展示這些過程如何與世界不同地區李的資本主義變遷有密切的相關。

在「理論觀點」的部分，也充滿了資訊與傳播科技的主題。Francis Nyamnjoh深省於中非和西非對於人類鑲嵌於本體論（ontology）中「人類的不完整與組成」一觀點，詳述其如何受到科技使用的影響。

而我們的部份則是關注於特定國家、區域的社會學。Filomin Gutierrez接下了拜訪菲律賓同事的任務，帶給我們一些重要的社會學議題，這包括：都市研究、應用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

這些「議題開講」（Open Section）中收錄的文章都涉及了重要的社會學議題，像是：性別化的公共空間、勞工國際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以及對於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的反應。■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 *全球對話以17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編：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阿拉伯： (突尼西亞)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爾及利亞)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US Rokeya Akhter, Juwel Rana,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Muhaimin Chowdhury, Helal Uddin, Md. Eunus Ali, Mostafizur Rahman, Jhilik Saha, Maria Sardar, Tahmid Ul Islam.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尼：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Faezeh Khajehzade.

日本：Satomi Yamamoto.

哈薩克：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波蘭：Justyna Kościńska, Magdalena Kamela, Aleksandra Lubińska, Adam Müller, Jonathan Scovil,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gnieszka Szypulska, Iga Łazińska, Aleksandra Senn, Sara Herczyńska, Zofia Penza-Gabler, Iwona Bojadżijewa, Weronika Peek.

羅馬尼亞：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Bianca Mihăilă, Alexandra Mosor, Mioara Paraschiv, Maria Stoicescu.

俄羅斯：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臺灣：李宛儒, 林玟圻,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黃昱閔.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過去幾年中，世界上許多國家見證了社會運動與公民示威活動的崛起。這些抗議與行動主要發生於街頭，他們處理的議題包含反民主傾向、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市場導向經濟的影響，以及社會不平等。此主題有四篇文章，其內容主要針對發生於香港、伊拉克、黎巴嫩、法國、智利等國家的這些社會運動與抗議，所具有的特定形式。

此主題提供人們菲律賓社會學的不同觀點。菲律賓社會學學會的成員將在文章中分享他們的研究，其內容包含都市化與政府管理、LGBT運動、毒品戰爭中的暴力行為、在貧困中做公共社會學，以及民答那峨島地區的邊緣化。

在這期雜誌中，全球對話發起了以COVID-19為主題的一系列文章，以討論流行疾病對於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社會／社會學之意義與影響。在此主題中，有三位社會學家和我們分享他們對於社會學近日以來面臨的挑戰與責任。

GD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社會學對話

共生主義者宣言：新興政治理念——Alain Caillé專訪
Sari Hanafi, 黎巴嫩 5

> 抗爭與社會運動

全球發展與地方運動
Johanna Grubner, 奧地利 8

2019-20香港抗爭事件：新傅柯式的視野
Ngai-Ling Sum, 英國 9

實驗政治：黃背心運動
Michalis Lianos, 法國 12

反對新自由主義不平等下的社會覺醒
Jorge Rojas Hernández、Gunhild Hansen-Rojas, 智利 15

伊拉克與黎巴嫩的十月起義
Rima Majed, 黎巴嫩 18

> 數位資本主義

數位資本主義中的媒體與傳播：批判觀點
Marlen van den Ecker、Sebastian Sevignani, 德國 20

連結傳播與勞動：數位剝削
Marisol Sandoval, 英國, Sebastian Sevignani, 德國 22

自動化與資本主義
Mark Andrejevic，澳洲 25

時間性與中國數位勞動階級的形成
Jack Linchuan Qiu，香港 27

美中抗衡——數位科技與文化工業的戰爭
Tanner Mirrlees，加拿大 29

自由市場會促進後社會主義的新聞自由嗎?
Mandy Tröger, 德國 31

> 理論觀點

Juju：資通技術的非洲啟示
Francis Nyamnjoh，南非 33

> 菲律賓社會學

在菲律賓「做社會學」
Filomin C. Gutierrez, 菲律賓 36

菲律賓的都市研究：以社會學定錨
Louie Benedict R. Ignacio, 菲律賓 37

利用酷兒視角導引衝突
John Andrew G. Evangelista, 菲律賓 39

針對菲律賓毒品戰爭的不同調敘述
Filomin C. Gutierrez, 菲律賓 41

使公共社會學在菲律賓發揮作用
Phoebe Zoe Maria U. Sanchez, 菲律賓 43

在菲律賓社會學中「主流化」民答那峨島
Mario Joyo Aguja, 菲律賓 45

> COVID-19：疫情與危機

疫情下的全球社會學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時 47

COVID-19：當前疫情的第一課
Klaus Dörre, 德國 49

後疫情世界的社會學
Sari Hanafi, 黎巴嫩 51

> 議題開講

孟加拉的性別化都市空間
Lutfun Nahar Lata, 澳洲 53

勞工國際主義與資本的自由流動
Raquel Varela, 葡萄牙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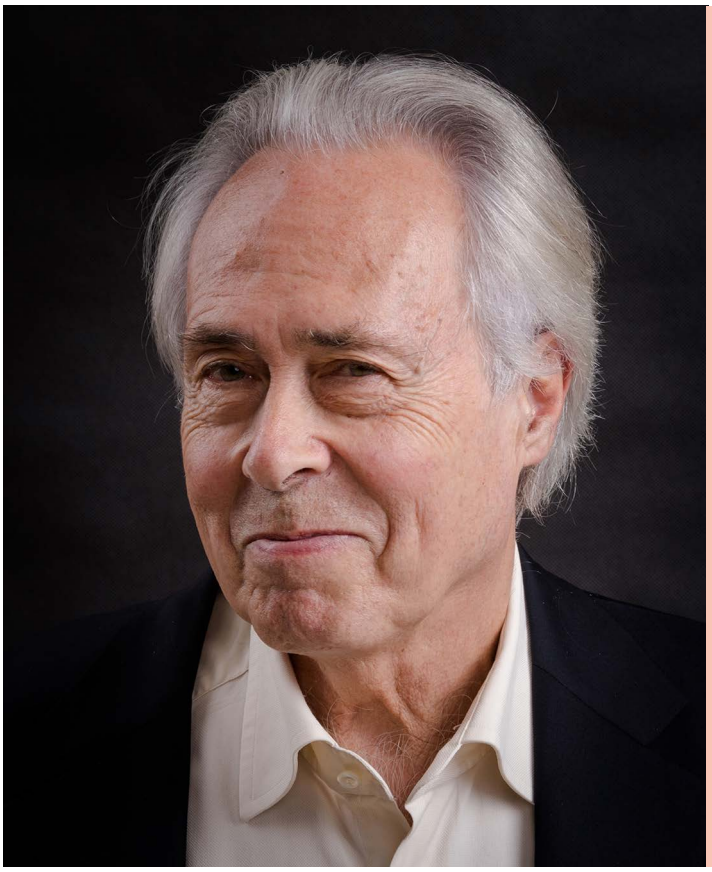
葡萄牙面臨極右派的威脅
Elísio Estanque, 葡萄牙 57

「年輕世代逐漸意識到迫在眉睫的生態危機，但他們卻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不去質疑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也不給民主想像賦予新的生命，我們將無法去解決生態危機。」

Alain Caillé

> 共生主義者宣言：新興政治理念

——Alain Caillé專訪



Alain Caillé 身為巴黎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 大學社會學榮譽教授以及MAUSS評論的編輯，以其對於當代經濟與實用主義的犀利批判聞名，並且是共生主義者宣言（Convivialist Manifesto）的發起人。這篇訪談是在第二版的共生主義者宣言釋出後，由ISA執行長Sari Hanafi 所進行。

Alain Caillé.來源：Alain Caillé.

SH：可以請你和讀者簡介一下共生主義者宣言的內容嗎？

AC：在討論這件事之前，我必須先提一下，第二份共生主義者宣言是由來自33個不同國家的將近300名知識份子共同簽署，其中包含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社區活動家，以及藝術人士。正是這些人組成了「共生主義國際」的雛形。共生主義國際並非正式的國際組織，沒有辦公室、沒有組織架構，也沒有資金，僅有的是善意，其將宣言擴展至這300名簽署人之外、擴展到其他知識分子、活動家和藝術家——最重要的是，它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重大轉變。數十年以來，我們都生活於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與霸權之下——就如Gramsci會說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使我們難以想像一個不同於現實的世界，並服從於投機資本主義的規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帶來了扭曲的不平等，其日復一日地將人們對於民主的理想掏空。除了那些試圖反抗獨裁者的國家，在多數地區，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於民主的理想越來越失去信念。這個現象顯然是個災難，民主的現況就如同1930年代的歐洲一樣，於全球範圍受到威脅。在此情況下，任何有關於批

>>

判思考的事物，都處於消失的危險中，而社會學更是首當其衝。

SH：為何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此強大呢？
AC：新自由主義具有龐大的物質、經濟、金融、軍事、警察、媒體等資源作為基礎，有時還有非法的資源支持。然而，作為另一股影響力，共生主義雖然較少被察覺，卻是至今為止少數能夠聚集如此大量人們的一種理念——這些聚集的人們所渴望的，並非是現在這個以金錢與利潤邏輯為運行規則的世界。我們清楚地知道，這個世界即將面臨難以彌補的氣候與環境災難。在較為富有的國家，年輕人們逐漸意識到生態浩劫的迫近，然而他們卻並未意識到，如果不正視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存在，我們便無法面對這些危險，更無法賦予民主活力。

理論上來說，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以六個部分構成：1）沒有社會，只有個人。2）貪婪是值得稱許的。3）社會越富有越好，因為所有人都會因涓滴效應而受益。4）包含自我監控與投機性質的自由市場，是人與人之間唯一適用的協作模式。5）這一切是沒有上限的，越多越好。6）這些是沒有替代方案的。令人驚恐的是，即便這六個部分沒有任何一個具有實際理論基礎，我們卻不確定自己要用什麼理由反對他們。

SH：你會怎麼解釋這樣的現象呢？
AC：我們至今仍然無法對抗新自由主義，是因為這些從過去傳承下來的、偉大的政治理念，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它們任意之間的組合），已經不再有辦法處理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問題。這是因為1）這些意識形態，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上的：人類是以物質為首要需求的存在，且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由物質產生——以生產更多的物質為解決辦法，辨識根據此前提所得出的結論。2）只要在自然永遠無法被耗盡，且我們並未面臨長期停滯、經濟增長幾乎為零的情況下，前述的「解方」便是合乎邏輯的。然而我們現在知道了，情況並不是如此。3）這些意識形態傾向將人們視為以物質需求為本的存在，卻忽略同樣重要的另一項衝突根源：對於受到認可的渴望。這些意識形態從未告訴我們，不管是在國家內或是國家之間，不同的文化與宗教應該如何「相處」，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就更不用說了。

共生主義（convivialism）一詞可以被視為一個空白的能指（signifier）——就如Lévi-Strauss所說的mana一樣——其象徵著人們對於一個新政治理念的希望。在這個新的意識形態中，那些渴望建立一個「後新自由主義世界」的人們都能獲得認可，也都能將它們對於新世界的期待填置於這個詞之中。

SH：不過，你認為以「共生主義」作為這個新政治意識形態的專有名詞，是一件合適的事嗎？
AC：「共生主義」這個詞是適切的嗎？新自由主義是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們將這些指稱為「新自由主義」又是否合適呢？在英文和法文裡面，conviviality　一詞指的是和朋友聚會玩樂、共度美好時光的技藝，也因此其有著「美好」的內涵。這的確讓我們的一些潛在支持者感到有點排斥，不過我們也很難想到可以找到更好的詞彙，去描述「共同生活」的生活哲學。這個詞彙促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就像Marcel Mauss說的——人們要怎麼在不互相殘殺的情況下對抗對方，又為何必須藉此互相合作？然而，我們所探問的，真的是我們應該問的嗎？在我們接觸的學者中，有些人並沒有簽署這份宣言；他們認為現代的真正問題並不來自新自由主義霸權，而是來自於民粹主義的崛起。不過我認為，只要讀過Karl Polanyi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就會知道，後者其實正是新自由主義霸權下的產物，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SH：共生主義有什麼基本原則？
AC：共生主義並非只是空白的能指，也不只是希望的象徵。我非常高興有如此多元、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知識份子，願意就共生主義的這五個基本價值達成共識。在這些人中，有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更有著多元的宗教信仰。這五個原則分別是共同的本性、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會性、合理的個體化過程，以及創造性對立（以對立的方式合作而不互相殘殺）。請恕我無法太詳細的告訴你這五個原則的細節。總之，這五項原則劃出了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論的空間，並限定了這個場域中，何種政治選擇才是適切的。五個原則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共同形塑出一個終極的理念：抵抗「過度（excessiveness）」以及「傲慢（hubris）」的必要性。人類已經沒有剩下多少時間，能學習如何控制自身的傲慢傾向了。幫助我們做到這件事，可能正是社會學如今的首要任務。

>>

SH：你的社會學是否呼籲要將社會學與道德哲學做出連結？
AC：在其他事情上是這樣沒錯。雖然這樣有些怪異，但是我無法不以道德與政治哲學家的身份，去閱讀馬克思、托克維爾、韋伯、涂爾幹等人的偉大社會學經典。雖然像霍布斯或是盧梭（他甚至曾說：「我們先不要考慮事實是什麼」）等哲學家並不關心歷史性和事實，但其他哲學家並非如此，就連人類學對他們來說都是重要的。如果我們不試圖探究過去的社會形式留下了怎樣的影響，我們便無法真的了解現在的世界。正是因為這樣，我對於Marcel Mauss非常有興趣，在他的討論中，呈現了過去的社會如何組織、人們又如何在這個過程中，透過現象學傳統中所謂的「捐贈」，以相應於個人參與和禮物的比例取得認可。對於這樣的場域，mana便是最精準的指稱。若是以缺乏道德哲學的視角閱讀這些經典，我們將無從得知其精髓，更不會對其產生興趣；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建立事實為追求的社會學，只得落入追求事實的無限循環（事實為何？其何以成為事實、又為何成為事實？），最終無法顯示其重要性並枯竭。

SH：你會考慮和道德企業家中的宗教權威進行討論或合作嗎？
AC：我相信要避免生態、經濟、金融、社會、政治和道德等災難的唯一機會，就是讓全球都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和緊迫。而對於目前主要由金融和投機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災害（你應該已經注意到，我在談論的並不是有關於資本主義的任何事情……），我們必須盡可能地在更多的國家完成輿論的動員。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認為成功機會有多大。可以確定的是，沒有宗教權威的支持，我們就沒有機會成功。這也就是為什麼第二份宣言中引用了很長一段《人類博愛促進世界和平與共同生活宣言（Human Fraternity for World Peace and Living Together）》的段落。這個宣言是在2019年2月4日時，由教皇方濟各與阿茲哈爾大伊瑪目（Grand Imam of Al-Azhar），以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名義共同簽署。對我來說，我認為新教、佛教與猶太教等道德權威，沒有理由不與這樣的宣言做出聯繫。或許我們應該立刻嘗試創立一個類似「世界人類共同大會（World Assembly of Common Humanity）」的東西，將認同於共生主義原則的群體代表，像是世界公民社會、哲學，所謂的「精確科學」，人類科學和社會科學，甚至不同的倫理、精神和宗教潮流的群體，全部集合起來。在我看來，ISA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讓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SH：從全球南方的角度上而言，這份宣言有其有效性與可信度嗎？有任何針對這些國家的相關研究嗎？
AC：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答案會是肯定的，是因為有許多簽署這份宣言的人便是來自你所說的全球南方，而且自從第一版宣言發布之後，便有許多來自全球南方的人參與於相關活動之中。答案是否定的，則是因為大部分的寫作和起草，都是在北方完成。現階段而言，南方挪用並豐富了共生主義的概念，這是很重要的一步。這份宣言正被翻譯成多種語言，除了英文、德文、義大利文和日文，也包含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預計將會把翻譯後的版本帶去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希望能到印度、非洲等地區。阿拉伯文的版本也因為一些原因特別地重要。讓我們回到主題上。我想說的是，為了達成後新自由主義的共識，第二份宣言已經在生態、經濟和政治問題上奠下了基礎。這已經很好了，但要整合有關於後殖民，性別，次等文化討論的所有觀點，我們需要做的還多著。這也是為什麼接下來將有第三份、甚至更多版本的共生主義者宣言（或說是共生主義者宣言補給），畢竟它總是會需要一些修改與更新的。在往後的這些工作中，南方的貢獻將是無可缺乏的。

SH：你對於擴展共生主義感到樂觀嗎？
AC：我覺得第二份共生主義者宣言為我們迫切需要的政治哲學奠下了基礎。不過政治哲學的出現，並不會讓政策自己出現。為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必須要找到「政治企業家」介入，讓全球的人們，不管是一般雇員、收入不穩定的工人、遭受種族隔離的族群，還是小商人或企業家，都能夠知道共生主義將帶來的影響。如果在這些廣大且多元的群體之中，有任何一個人開始感覺到、並和其他人說：「我認為自己是個共生主義者」，我們便有機會阻止可能發生的災難。

SH：感謝Alain，祝共生主義者宣言一切順利。 ■

來信請寄至：
Alain Caillé <alaincaille90@gmail.com>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 全球發展與地方運動

Johanna Grubn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奧地利，全球對話*Global Dialogue*）編輯助理

在Covid-19 爆發和頒布遷移與集會權限制之前，發生於全球各地的示威遊行，反映出抗議活動正不斷增加。這些抗議活動最主要是通過街頭表達，以處理不同的議題與需求。這場研討會包含了五個部分，正反映出這些社會運動與抗議發生的特定形式，而這五個地點分別是黎巴嫩、伊朗、法國、智利，和香港。.

這場研討會以Ngai-Ling Sum發表的一篇文章開場，他檢視了2019年6月香港在街頭發生的抗議事件。Sum 使用新傅柯式（neo-Foucauldian）的觀點詮釋這場抗議並進行分析：在不自由政權的條件下，社會運動是如何急速地發生？藉由不合理的警察暴力，政府對國家的控制日漸增強，抗爭又如何可能？前線的暴徒在肯定式的生命政治（affirmative biopolitics）下，如何保護生命免於（接近）死亡？

在2018年11月，法國各地出現了黃色背心的抗議活動，開啟了社會運動中的新結構與新實踐。Michalis Lianos的文章分析了這項具有自主性，卻無黨派形式的社會運動，其挑戰了我們對於組織、架構（architecture）、集體政治行動（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反身性（reflexivity）的社會學理解。

在經過40年的新自由主義式政治與持續的抗議浪潮後，智利人的腦中綻放了新的解放意識，觸發了2019年10月大規模、具創意性的抗議活動。Jorge Rojas Hernández 和Gunhild Hansen-Rojas描述了從新自由主義衍生出的國家社會危機。智利面對的獨特歷史機遇（opportunity）與社會中的抗議活動，引發出就全民公投建立新憲法的評估會議。

最後，我們以Rima Majed的研究來為這次的研討會作一個結尾。Rima Majed探討了2019年10月在伊朗及黎巴嫩發生的暴動，她以一種稱為協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在政治體系中引發的革命過程對這場暴動進行分析。為了尋會遺失的「我們」，社會行動者必須抵抗宗派主義下的分權模式（sectarian power-sharing），將社會及政治焦點放在社會經濟正義的需求上。■

> 2019-20 香港抗爭事件：

新傅柯式的視野

Ngai-Ling Sum,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香港2019，示威者以雨傘保護自身免於警察的催淚瓦斯攻擊。攝影：Joe Lee。

2019年6月，引渡條例引起了香港的抗爭事件。如果通過這項條例，將允許遣返香港的公民／遊客進入中國大陸，根據當地的法律制度規定（或不根據規定）受到刑事訴訟。這激起了當地人對於香港將失去一國兩制框架下「高度自治」的恐懼。當香港1997年作為特別行政區（SAR）返回中國大陸時，「高度自治」這點受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及中國1990年《基本法》的保障。在這個框架下，香港擁有行政權與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機構，以及中央政府根據當地選舉或協商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利。

自2003年以來，隨著中國大陸主權下對「一國」政治的進一步發展，香港的人們越來越擔心失去自治權。例如，從2003年的第23條反顛覆法案（Article 23 anti-subversion bill）到2019年的中國國歌條例等親中法律的實行。而這些措施正伴隨著香港民主要素的消減，例如在2015年中國拒絕了香港直選行政首長，以及在2017年取消六名民主派立委的任職資格。2019年對引渡條例的緊密追蹤，更加凸顯了這種一國政治下對權利的侵害。香港特區的政府在中國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甚至跳過了委員會審議階段的常規立法審查，直接將該法案提交親中的立法機關批准。面對如此緊急的情況下，6月9日時有一百萬人參加了和平遊行，6月16日甚至達到了200萬人。由於官方遲遲不給出回應，加上港警的暴力行為，使抗爭活動持續不斷。抗爭者提出五大訴求：撤回引渡條例；停止以「暴徒」形容示威者；赦免所有遭逮捕的抗爭者、獨立調查警察的暴力行為、落實香港行政首長及立法會的普選權。最終，引渡條例在2019年10月4日撤回。然而，由於警察暴力的反覆發生，以及香港特首拒絕接納抗爭

>>

者其他四點訴求(見表一),原初的抵抗事件逐漸演變成社會運動。

在將這起抗爭事件分析為社會運動時,本文將採用新傅柯式(neo-Foucauldian)的觀點,關注主權生命政治下的生命/死亡。傅柯認為,統治者會自認有權力去統理一塊領土,並參與生命/死亡的生命政治去維持本身的安全。在現代社會中,主權(sovereignty)的程度各不相同,在不自由的獨裁政權背景中,主權會比民主國家更加明顯。隨著香港一國政治的開始,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國大陸的一黨制政體一起參與了共同主權(co-sovereign)的規則,維護香港的穩定/安全。香港的抗爭者生存在這共同管理的獨裁政權邊緣,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他們抵抗的生命政治,也因此涉及於將自身生命武器化、投注於死亡(或死亡邊緣)的前線暴動者;以及確保了暴動者的生命安全,使其免於(接近)死亡的支援者。

> 暴動的生命政治:武器化下(接近)死亡的生命

面對中國大陸加速進行的一國政治,以及2019年隨之觸發的抗爭事件,警察及法律在生命政治的的不同環節中扮演了統治者的角色:一、削弱了上街抗爭的生活模式;二、以逮捕、起訴、訴訟施加恐懼;三、透過不成比例的暴力造成人身傷害。在中國中央政府以「幾乎是恐怖份子」譴責抗爭者,而香港特首又不回應於五大訴求(見表一)之際,抗爭活動的手段已從和平轉為兇殘(見表二)。防暴警察在特首的支持之下,已經反應出更多兇殘的制暴手段:催淚瓦斯、任意或強行逮捕、虐毆、化學水炮車,甚至是槍擊。他們為抗爭者貼上了「蟑螂」等標籤,表示為了安全他們應該被消滅。這已經惡化成「暴力引起更多暴力」的局勢,抗爭者已經開始感受到個人或公眾的恐懼及無助。

表一:香港抗議者的五大訴求,2019

撤回《逃犯條例》
停止以「暴徒」定義示威者
釋放被捕者且撤回控罪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隊涉嫌濫用武力的問題
實行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

表二:抗議的和平與武力形式

抗議的性質	舉例
和平	示威、人鏈、在公共場所唱歌/集會、製作海報/法令、列儂牆/隧道、國際宣傳等。
武力	噴霧罐、雷射火把、街頭戰鬥、汽油彈、路障、私有與公有財產破壞、投擲磚塊、縱火焚燒親中國的商業網點、圍攻大學等等。

前線的抗爭者為了回應不成比例的警察暴力,以及他們對自己和香港未來的恐懼,將自己的生命武器化進行抵抗。他們的抗爭為「香港人」的認同提供養分,促使其成長。一些暴動者準備犧牲他們的生命,捍衛/拯救香港裡那些始於「兩制」的自主生命。在與警察的戰區式戰鬥中,有些人甚至將遺囑(和非自殺聲明)放在了他們的背包裡。這些個人反映出了「為香港社會獻出生命」、「用我的鮮血捍衛香港」以及「用死亡換取自由」等精神。在香港暴動的生命政治中,這些將自己的生命武器化的生命政治,強烈地形塑出希望/恐懼、震驚、憤怒、眼淚、鮮血和(接近)死亡的方式。抵抗行為則涉及於生命政治中的心理創傷、自我犧牲、身體受傷的恐懼、逮捕、拘留,起訴、監禁、失蹤,和自殺。

> 肯定式的生命政治:保護生命免於(接近)死亡

抗爭者的暴動的生命政治正採取積極的行動來保護生命。在上次2014年雨傘革命的主要人物,得知社運領導人可能會遭到起訴和監禁的經驗下,使當前的社會運動在沒有正式領導人的情況下運作。運動中採取無領導者的策略,以及「像水一樣」互助的擴散策略,通過像Telegram和Airdrop之類的網路應用程序來分享情報,與彼此協調行動與抉擇來促進這項策略。

這場運動由雲端集資,並得到一些跨職業、跨世代、跨性別及跨種族陣線的互助團體幫助。這些支援者齊聚一堂,保護暴動者的生命免於(接近)死亡。 一個例子是由「銀髮」的老年人團體發起的「保護兒童」運動,以保持警惕保護第一線的青少年;有些人則是選擇站在防暴警察和抗爭陣線之間;而其他人則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不

>>

2019年於香港的大規模示威。攝影：Virginia Pak。

要對我們的孩子開槍」。生命政治的供應鏈也支援了這些保護生命的行動，像是：提供捐款、食物、水、口罩（用於保護身份或個人安全）、雨傘、資料保護、免費的交通，醫療支援、社會照護、法律諮詢，以及能容納第一線人員的開放式房屋。

其他積極的生命政治形式還包括：一、在香港海港的兩岸形成一條三十英里的人鏈，象徵對自由的渴望； 二、發起公開哀悼死者的活動，以治癒公眾受傷的心靈，同時重新許下承諾；三、在五天內完成並錄製新歌，例如《願榮光歸香港》，以鼓舞士氣並團結起來；四、組織新的工會和選舉支柱，以鞏固街頭抗爭的力量。而我們可以在（跨）本地和（跨）國中，找到類似激勵人心、充滿正能量的做法。香港擁護者與散居海外的人士／支持者攜手合作，以地方社區、國家立法機關、全球媒體和國際組織為目標，爭取在這場鬥爭中「與香港站在一起」，進行國際倡議與人民外交。

> 結尾短評

本文對香港2019-20年的抗爭採取了新傅柯式的研究取徑。考慮到這是在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國大陸一黨政體，共同主權統治中的不自由獨裁體系條件下發生，主權生命政治的觀點對於理解這場抗爭而言非常重要。這也突顯了2019年的緊要局勢，當時在香港全面實行的一國政治，正伴隨著一些支持一國兩制的公民拒絕放棄香港的「高度自治」。而這種對一國兩制的鬥爭是體現於，主權國家透過不成比例的警察暴力，越來越堅信能如此控制香港。在這場香港政治移轉的鬥爭中，抗爭者中暴動的生命／死亡的生命政治與支援者的積極生命政治行為並存。■

來信請寄至
Ngai-Ling Sum <n.sum@lancaster.ac.uk>

致謝
我想要特別感謝Brigitte Aulenbacher, Bob Jessop, Virginia Pak, Joe Lee 以及Lancaster Stands 跟他的香港團隊協助攥寫本文及提供照片。

> 實驗政治：黃背心運動[1]

Michalis Lianos, University of Rouen, 法國

2019年巴黎，大量警察出現於示威遊行中。攝影：Michalis Lianos。

黃背心運動在毫無預警地情況下發生。因此，法國的社會大眾完全不知道這場社會運動的潛力。眾所皆知，既有的政治機構與大眾傳播媒體嚴厲抨擊該運動。然而，這並不意外，因為法國國民多視白人下層階級為遭隔離的少數族裔與中產階級間的緩衝帶。更令人驚訝的是出現自發且無黨派的運動，並打破後工業社會中既定的政治分層架構。這當然與新政黨（共和前進黨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在法國贏下總統與國民議會的選舉，以及出現從未當選過公職的新任總統這種罕見結局有關。對進步改革的期許很高，但隨之而來的失望也很高。

該運動首先在2018年11月17日浮現在全國公共領域中。兩週後，該運動成為全球頭條新聞。在這段時間中，一個驚人的轉變正在發酵。黃背心運動從一開始與燃油稅掛鉤的爭議，迅速地朝向質疑當代社會整體政治體制架構發展。他們現在的訴求是建立全民公投，讓人民

>>

2019年巴黎，一位示威者描述自身的處境。
攝影：Michalis Lianos。

可以對於各領域重要議題的治理有完全的控制權。同時，他們聲稱自己是受到屈辱的「人民」，受到菁英階級的忽視，好像理應就在近乎貧困的生活裡漠不作聲，即便他們代表了法國社會的核心。他們多運用非政治或和平主義者的自我認同來特別增強社會合法性，因為當中的多數人未曾參加過示威遊行活動，並對政黨漠不關心或敵視。因此，當他們受到武裝鎮壓時感到震驚與被冒犯，他們認為自己是初次行使抗議權的守法公民。

除了做為一個抗爭運動的重要性之外，黃背心運動還為社會運動的結構與實踐開闢一個新階段。該運動有許多具原創性的部份挑戰一系列有關集體政治行動的性質、組織與成功的假設。我將簡要介紹五個層面，來說明這些創新的社會學意義：

1. 拒絕任何與政黨或社會運動組織的聯結

這場運動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自發性。黃背心運動並不是因為特定的政治取徑或理論而聚集在一起，也沒有共享任何寬鬆意義下的政治觀點。他們甚至連鬆散的政治觀點都沒有。然而，他們卻本能地認為，不應該信任任何政治結構。任何持有或追求權力的人在他們眼中都是腐敗，或僅僅是對自身利益感興趣，而不是關心「人民」的共同利益。這並不代表黃背心運動走向「民粹主義」。相反地，他們不僅不允許獨裁主義，更不允許黃背心運動內部擁有階層制度。他們以極快的速度，組成了由個體緊密構成的社群，並自稱是一個「家庭」；不管自己同不同意，這群人謹慎小心的捍衛著能對於各個議題做出決定的權利。總而言之，他們自發性跳脫任何既定的社會政治框架或平台。

2. 意識形態多元化

眾所周知，社會運動傾向意識型態的同質化。儘管在社會運動中時常發展出緊張與敵對關係，但這種緊張關係圍繞在控制一個意識型態的統一框架、以及與之相應的行動，幾乎都是理所當然。黃背心運動再次成為同質性規律的例外。他們不僅沒有限縮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同時還設法建立多元化的基礎。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他們堅決不讓政黨政治干預此社會運動，也因為他們在特定議題上意見分歧時能夠自發地接受彼此地共處。他們的解釋是具備經驗性基礎的。儘管他們「一團糟」，但重要的是，他們有著客觀的相同之處與改變現狀的意願。他們對現況的解釋可能不同，但總是與一種制度有關，即有權勢者沒有充分尊重人民，來確保人民能過體面的生活。

3. 神經元結構與自治

這場社會運動是透過在網路或實體空間中部份重疊群體所自發性組織而成。每個參與者都通過一個或多個線上小組或或空間參與討論、辯論、集會與抗議活動。這種神經元結構的發展完全滲透法國（包括偏遠的殖民領土），這是黃背心運動的重要特色。網路所提供有關個

>>

人自治的意識，充份反映在他們選擇全國各地做為社群聚集地。這兩個情況的概念性假設為自治交會點會確保只有這樣的社會網絡才能擁有權力，沒有管理頂層，也沒有執行底層。

4. 直接民主

自然而然，這些特徵形成一種象徵性的基礎，在此政治形態中，持續且平等的參與是前提，而非烏托邦式的目標。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個由受過良好教育、低下階層、初次抗議者等群體組成的社會運動，準確地指出了代表性參與與決策系統的危險性與過時。他們使用兩種強而有力的方法來表達這一訴求。首先，不允許任何人在任何層次上代表黃背心運動。儘管所有政治機構強力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選出常任代表，但他們只有逐案選出發言人。沒有任何人能夠以“黃背心運動”的名義發言，任何企圖這樣做的人都等於背叛這場運動。第二，他們認為應該要改變當代社會的整個政治結構。他們要求在每個領域引入由公民發起的公民投票。由公民做出決策，而“政治精英”執行他們的決策。

5. 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

今天是2020年2月23日，黃色背心運動的第67週。毫無疑問地，這是近期歷史上持續最長的政治抗議活動。黃背心運動從來沒有追求特定的烏托邦，也沒有一個預定要實施的政治計劃。相反地，他們在多元化優先議題與思想上保持互相開放的態度。這使他們達到前所未有的集體反身性。他們專注在推動全面性的政治改革，而不是在既有的體系中爭取權力。因為這樣的態度，他們不介意結果的不確定性。正如我訪談他們的時候常說的：「我們必須繼續，我們將看到成果」。

儘管數量不多，但法國各地仍在進行黃背心運動的集會、遊行與抗議活動。每個人都好奇，這場社會運動將會產生什麼影響。無論如何，能夠得到一個結論。黃背心運動已經證明，集體政治是可能的。作為大規模直接民主的象徵，他們在個人經驗、社區與政治形態中建立新的連結。■

1. 本篇文章自黃背心運動開始，建立在嚴謹基礎的經驗研究。其他分析請見這裡，這裡 或 這裡。

來信請寄至：
Michalis Lianos <michalis.lianos@univ-rouen.fr>

> 反對新自由主義不平等下的社會覺醒

Jorge Rojas Hernández, 礦業與農業水質研究中心 (CRHIAM), 智利、**Gunhild Hansen-Rojas**, Universidad de Concepción, 智利

敲打鍋子是智利抗議活動的一部分。
攝影：Diego Correa/flickr.com.保留部分權利。

智利當前的社會抗爭事件(estallido social)都創意地伴隨著塗鴉、壁畫、音樂、詩歌、歌曲、會議和集體辯論，智利人在歷史上累積的不滿情緒，也因此以一種新的美學形式表達。人們用一些口號譴責數十年以來的不滿、社會弊病、歧視和社會不公等現象，例如：「智利覺醒了！」、「...直到人類的尊嚴成為每一天的日常！」、「智利將埋葬新自由主

>>

義!」、「我已經不再害怕!」、「不要再這樣對待我們!」、「留下個人退休金!」、「市場不會保護社會權!」、「我們並沒有發生戰爭!」、「新憲法!」、「沒有我們女性,就不會有政治協議!」、「我們需要新的民主!」、「全民免費教育!」、「自由的公共水權!」、「我最擔心的是一切都不會改變!」、「常態就是問題!」、「爭取和平生活的權利!」

> 痛苦的覺醒

智利在2019年10月18日變了。人民壓抑在內心的憤怒,以一種既巨大又富有創意的方式解放。而現在,經過四個月持續不斷的抗爭活動,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不可逆的新共和式精神。40年後,智利人開始意識到盛行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t)和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社會不平等,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基礎服務、退休金、教育、醫療照護、自然資源。然而,政府卻以警察暴力作為回應。有400多人因為槍擊失去了視力、女性遭到了強暴、發生私刑、上千人遭到隨意逮捕。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和其他的國際組織,已經確認智利的人權受到了嚴重的侵犯,並呼籲智利政府積極地採取行動。

智利社會的覺醒並不是自發的,而是長年累積的負面經驗及不滿社會的複雜過程下的結果。40年後,新自由主義體系已經耗竭並迎來了最大的危機,暴露出該國難以恢復的不可逆傷害。藉由抗爭活動與氾濫的新資訊,一股新的解放意識正在智利人的心中漸漸形成。

> 社會及生態不平等、社會運動

智利在社會和結構上不平等增加的速度比原初對市場的承諾還要快:低薪資、不合理的退休金、醫療和教育體制私有化以及隨後上漲的費用、工作不穩定、昂貴且私有化的基礎服務、驚人的生活成本,以及財富的極端集中。此外,年輕人難以進入勞動市場、針對女性的歧視依然存在、原住民族的權利依然沒有受到認可。公眾參與過低、環境問題、應付氣候變遷的脆弱性,以及水資源和一般資源的匱乏,也導致基礎服務的提供出現其他問題。

這些私有化及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的政策必然會使意義喪失,同時造成未來的不確定性,抗爭活動跟出現新的社會運動就是一個結果:2006年發生了「企鵝抗議運動」(penguin protests)—高中生為了要求政府改善國民教育體系所發起的運動。接著在2011年發起了一個具影響力的大規模學生運動,要求免費的大學教育。這兩個運動在大眾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2018年出現了反對私有化退休金體制的「No+APF」運動。族群運動中,特別是馬普切人(Mapuche)社區的代表,要求他們要受到憲法的保障、土地歸還,並作為少數民族得到特定的自治權。同時,也有新型的環境和抗爭運動,反對導致生態系統和棲息地崩壞的大型開發案。位於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Hydro-Aysen水力發電廠也成為了這一運動最重要的象徵。此外,民眾反對環境政策的抗議活動,也出現在昆特羅(Quintero)、普瓊卡維(Puchuncaví)和科羅內爾(Coronel)市中所謂的廢棄區域(zonas de sacrificio)。由於這些地方受到了高密度工業的嚴重污染,導致該地區的高發病率。2019年也是女性運動中支持性別平等、反對性虐待的一年。從這些跡象中可以發現,智利社會已逐漸動搖,意識到了這種光鮮亮麗背後的陰暗面,並積極地從基層開始組織。

> 社會改革及社會契約/協定

在這種情況下,智利需要朝向福利國家的面相進行強力的社會改革,以彌補現有的不足並滿足抗爭者的訴求。一個包含各種社會組織的聯合組織—統一社會組織(Mesa de Unidad Social)要求在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下達成一項社會契約,其口號是「沒有社會正義就不會有和平」。 2019年12月22日,在智利大部分的城市裡,成功地完成了對市民緊急調查的問卷研究,其中有超過250萬智利人積極地參與了問卷調查,而有了以下的結果:91.3%的人希望制定新憲法; 89.9%的人願意參與2020年4月的全民公投;絕大多數人贊成能夠民主選舉的立憲議會。公民投票還顯示了三項重要的議題順位:改善退休金、改善醫療照護,以及保證能夠改善國民教育制度。因此,社會協定將是解決當前新自由主義危機的重要貢獻。

>>

這些社會訴求早已是二十世紀民主的一部分，但部分卻被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策略所廢除。正如當前全球發展和討論所呈現的那樣，福利國家的這些歷史成就在二十一世紀必定要再次被提及，並重新納入現有的政策之中，以保障人民的生活品質，抵抗右翼的民粹主義（populism）並確保國家的發展。

> 國家和政黨的合法性危機

社會危機揭露了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國家缺陷。新自由主義一直在呼籲建立一個最小政府（minimal state），建立私有化和個人化的社會。如今，人們已經感受到了這一學說毀滅性的後果。智利的保守派政府一時不知所措，以暴力、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和壓制作出反應，而沒有明確區分出廣泛、民主的和平抗爭活動，與少數獨立團體的搶劫、縱火和暴力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的智庫於2019年12月發表了以下智利人對政府機構的信心調查結果：只有5%信任政府，3%信任議會，2%信任政黨和8%信任司法機構。絕大多數人拒絕以暴力作為抗議手段，同樣也拒絕警察暴力。67%的人要求制定新憲法，56%的人認為制定新憲法是解決當前問題的重要手段，87%的人支持能夠促進社會和政治對話，達成共識的領導人。在調查中，有64%的人認為退休金是政府需要趕緊處理的問題，另外還有46%認為是健康，38%認為是教育。這份調查強調了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 為了新憲法和全新的民主

2019年11月15日，強烈而持續不斷的社會抗議活動，致使政府和反對派於2020年10月25日舉行的公民投票達成共識，制定了新的憲法。擬定新憲法的代表人將於2021年4月11日推選，並且必須滿足三個重要標準：滿足男女比例的平衡、必須是與政黨無政治關係的人，需要原住民族的代表。

有了這種公民投票以及相關的未來策略，智利將擁有獨特的歷史機會，在所有社會行動者的參與下和平、民主地解決現有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但是，保守部門拒絕支持這個計畫仍是一個潛在的阻礙，他們的目的是為阻止新憲法、現代化的制度、退休金、衛生和教育體制的改革，從而能夠維持現有的權力和市場結構。希望公民運動的訴求最終能夠體現於和平、民主的進程，以及社會各部門廣泛參與下的成功公民投票之中。■

來信請寄至：
Jorge Rojas Hernández <jrojas@udec.cl>
Gunhild Hansen-Rojas <hansen-rojas@udec.cl>

> 伊拉克與黎巴嫩的十月起義

Rima Majed,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ISA武力與衝突解決研究委員會 (RC01), 國族主義、原住民與種族 (RC05), 政治社會學 (RC18), 女性、性別與社會 (RC32), 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 (RC47), 社會運動, 集體行動與社會變遷(RC48)

2019年10月伊拉克起義期間貝魯特的示威活動。
來源:維基百科創用CC。

2019年10月世人見證伊拉克與黎巴嫩爆發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動員行動。抗議行動就如野火一般在兩國迅速蔓延,幾天內就吸引成千上萬的抗議者。其主要訴求為失業、稅收不公、普遍腐敗、欠缺基礎服務(如水電)與政府治理不善等問題。儘管上街表達這些訴求並非第一次,但2019年10月抗議行動的規模與以往任何社會運動相比都不太相同。在黎巴嫩,就跟在伊拉克一樣,這場起義迅速被稱為「革命」,這顯現出與先前動員(如兩國在2011年和2015年的抗議活動)浪潮的鮮明差異。

儘管這場起義跟傳統社會運動文獻中對革命的定義不同,因為他們沒有推翻整個政權,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從革命過程來考量,而非革命成功或失敗。實際上,伊拉克與黎巴嫩的十月起義是在兩國長達數十年周期性動員的背景下所爆發的,其中,2015年形成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基於社會經濟需求而出現的反政府的動員,不同於過度強調認同政治的視角。此外,這些革命性的"社會爆炸"顯然是在蘇丹與阿爾及利亞2018年底發生第二次阿拉伯起義浪潮的背景下而爆發的,因為兩國皆成功推翻獨裁統治者。

但是,將伊拉克與黎巴嫩的案例跟2011年以來阿拉伯其他地區的案例進行比較,其不同之處在於這兩國的抗議者試圖推翻政治體系。儘管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都是在具有專制政權或君主專制的國家發生的,但黎巴嫩與伊拉克是在協和式民主體制為基礎的政治體制中爆發起義的,這個體制是基於身分(宗派和族群)的權力共享,因此,沒有一個明確的"頭"要去推翻。加上新自由主義、宗派專制主義(稱為muhasasa)以及過往內戰與暴力的遺產,使這些起義的道路更加難以辨別。

> 宗派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立:會不會搞錯重點了?

自2019年10月,黎巴嫩與伊拉克的主要廣場到處都有示威者在揮舞國旗與唱國歌,兩國的示威者時常採取這一行為,來表達拒絕宗教與種

>>

族分裂，儘管存在多樣性，卻強調「存在」與「民族團結」。但是，民族主義與宗派主義是否一定是相反的？

數十年來的文獻表明宗派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兩種現象並不一定是相反的，因為民族主義經常帶有宗派主義的內涵。例如，阿拉伯民族主義常常與遜尼派色彩聯繫在一起，而黎巴嫩民族主義歷史上一直與基督教內涵聯繫在一起。然而，在社會層面上，運用民族主義作為拒絕宗派主義的標誌仍非常普遍。伊拉克與黎巴嫩的起義顯然渴望透過建立一個「想像的國家」做為解決宗派主義問題的解方。

伊拉克抗爭運動自10月初開始，當時有組織呼籲以Nazel Akhod Haqqi（我正在行使我的權利）的名義動員。伊拉克廣場上的主要口號為「人民想要推翻政權」，來呼應2011年的著名頌歌“我們要一個家園”。當抗議者提出建立「家園」、「國家」或「民族」的要求時，是希望能夠有一個為國民服務的國家，並提供超越宗派或種族分裂的歸屬感。

在黎巴嫩，同樣有著重新想像「民族國家」的類似過程。儘管起意與政府決定徵收新稅（包括對WhatsApp徵收的稅）有關，但廣場上很快就充滿國旗，國歌也不斷被重複撥放。雖然主要口號包含著名的「人民想要推翻政權」，但增加一個更量身打造的口號：「全部就是全部（All Means All）」，其拒絕宗派權力分享制度並譴責所有政治領袖，不管他們屬於哪個宗派。就跟伊拉克一樣，拒絕宗派主義是透過擺脫所有宗派領袖，並建立一個保護公民並平等公正對待他們的民族國家。

儘管許多人認為兩國的腐敗與不平等程度是宗派制度的後果，但這種觀點忽視經濟制度（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危機在這些起義扮演的重要角色。時至今日，伊拉克與黎巴嫩的社會運動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同時對抗宗派／新自由主義政權制度：其將重點放在社會經濟正義與福利國家的訴求上，同時拒絕宗派分贓權力的制度。

> 新自由主義與不滿：尋找迷失的「我們」

新自由主義盛行在戰後的黎巴嫩（1990年代後）與遭入侵後的伊拉克（2003年後）。國家倒退與宗派侍從主義的興起，加上關注個人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政治文化。不僅形塑國家與整個社會，也反映在激進主義與異議的性質上。
儘管有許多激進主義者已經在社會運動圈中活躍數十年，但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最大且最有效的訴求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在個人身上。例如黎巴嫩的Beirut Madinati （貝魯特，我的城市）是2015年黎巴嫩動員後的其中一個主要選舉活動。與其強調將城市重新視為所有人共享的空間並忽視新自由主義下個人主義邏輯中的「我們」，應該要更強調城市與個人的關係。相同地，在2019年金融崩潰後，黎巴嫩起義的激進主義者在銀行窗戶上噴上塗鴉，表明「還我錢」而非「還給我們我們的錢」。儘管人們對銀行的集體憤怒很明顯，但形塑激進主義的政治文化仍是它所反抗的體制下的產物。

許多社會運動還強調法律與基本權利的方針，然而，這似乎與黎巴嫩和伊拉克的現況脫節。因為兩國的法律與司法體系都非常薄弱且腐敗，人民對此幾乎都不信任。因此，「權利」與「義務」的用詞在這兩國人民的政治想像中並不佔主導地位。然而，一些著名的政治運動已經開始將個人“權利”作為激進主義的核心。幾個案例包含先前提到的伊拉克「我正動員起來爭取我的權利」，或黎巴嫩起義中非常活躍的政治團體“Li Haqqi”（為了我的權利）這種強調個人權利亦表明對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幻想與渴望，期許國家機構能夠平等的維護個人權利，而非腐敗與宗派侍從主義。

伊拉克與黎巴嫩的宗派—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後果是，缺乏代表政治替代方案的組織或聯盟，能夠當作起義轉往新政治體系的過度。隨著近來武漢肺炎在兩國的擴散，迷失「我們」運動的出現與組織顯然無法保護社會免受經濟災難，亦不能免除疫情大流行的危害。■

來信請寄至：
Rima Majed <rm138@aub.edu.lb>

> 數位資本主義中的媒體與傳播：批判觀點

Marlen van den Ecker,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 德國、**Sebastian Sevignani**,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 以及 University of Paderborn, 德國

在數位資本主義中使用者經常成為無薪勞工。攝影：Alex Kotliarskyi/unsplash.com.。

當代媒體技術不斷發展，並在通常被稱為「數位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的社會條件下進行傳播。與「後工業」(postindustrial)、「資訊」(informational)，甚至是「全球知識社會」(global knowledge society)的概念不同，「數位資本主義」呈現的是社會變遷同時在經濟剝削、文化性異化(cultural alienation)、和政治統治等基礎社會關係上，表現出的重要連續性。數位資本主義在全球各地內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雖然數位資本主義一方面促進創意性知識階層形成，並加速了消費主義(consumerism)；但在世界的另一邊，數百萬人以拆解所需的原料或在有害的情況下組裝組件來謀生。但是在多樣性之間也存在著統一性：使用者成為社交媒體平台或數位媒體製造商下被剝削的新階級。監視技術正在威脅公民的人身權利。以資本驅動的利益結構，阻礙了自我組織媒體(self-organised media)的草根(grassroots)民主和其顛覆性的潛能。

隨著數位媒體技術的實用性與日俱增，批判性媒體(critical media)和傳播社會學(communication

>>

sociology)為我們對整體社會變遷的理解提供了見解，甚至為我們的學科發揮了開創性的作用。這兩者解釋了新的一波理性化(rationalisation)、資格(或取消資格)，以及對勞動活動和價值鏈(value chains)的重組，對勞動和工業社會學做出了貢獻。而當調查大數據、演算法(algorithms)、目標式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和數位平台作為新市場的關鍵作用時，這兩者也與經濟社會學和消費社會學(consumer sociology)彼此互動。此外，這兩者與文化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合作，逐漸適應了數位文化產業和當前公共領域的轉變。而當他們涉及於像是「產消合一者」(prosuming)，這種在數位現象的傳播與勞動之間的模糊關係時，就會刺激社會理論的活化。

本次研討會文章中的批判性見解希望能拋磚引玉，引領出其他學者對這些問題追本溯源。

由於現有的批判式社會研究似乎對媒體和傳播沒什麼興趣；另一方面，傳播研究又經常會在數位研究中撇除剝削的問題。因此，Marisol Sandoval和Sebastian Sevignani通過「數位剝削」(digital exploitation)的思維，將傳播與勞動聯繫在一起。而時常忽略的是，當代全球媒體文化的產生依賴於傳播與合作——而這通常是由科技巨頭(Big Tech)控制和管理。我們作為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用戶，在公司可以取得人們的數據軌跡的情況下，同時也成為了這些公司的無償數位勞動者。

澳大利亞學者Mark Andrejevic也運用了以數據驅動(data-driven)的商業模型邏輯。他的文章探討了自動化產生數據及其增加趨勢，還有資本主義所有權和資本積累在之中發揮的作用。Andrejevic並沒有探究是否應該使用自動系統，反而質疑到目前為止這個體系是如何設計成形。

於香港研究的邱林川(Jack Linchuan Qiu)，探究了形成新的數位勞動階級的可能性。中國的例子顯示，政府的監控技術在空間性(spatiality)上，確實有強大的社會控制能力。然而邱林川指出，當關注於不同的時間(temporal)模式時，數位勞工階級在採取集體破壞性行動，例如放慢工作、刻意破壞、罷工時，可以發揮其顛覆性的潛力。而階級鬥爭便是數位勞動者尋求時間主導權的新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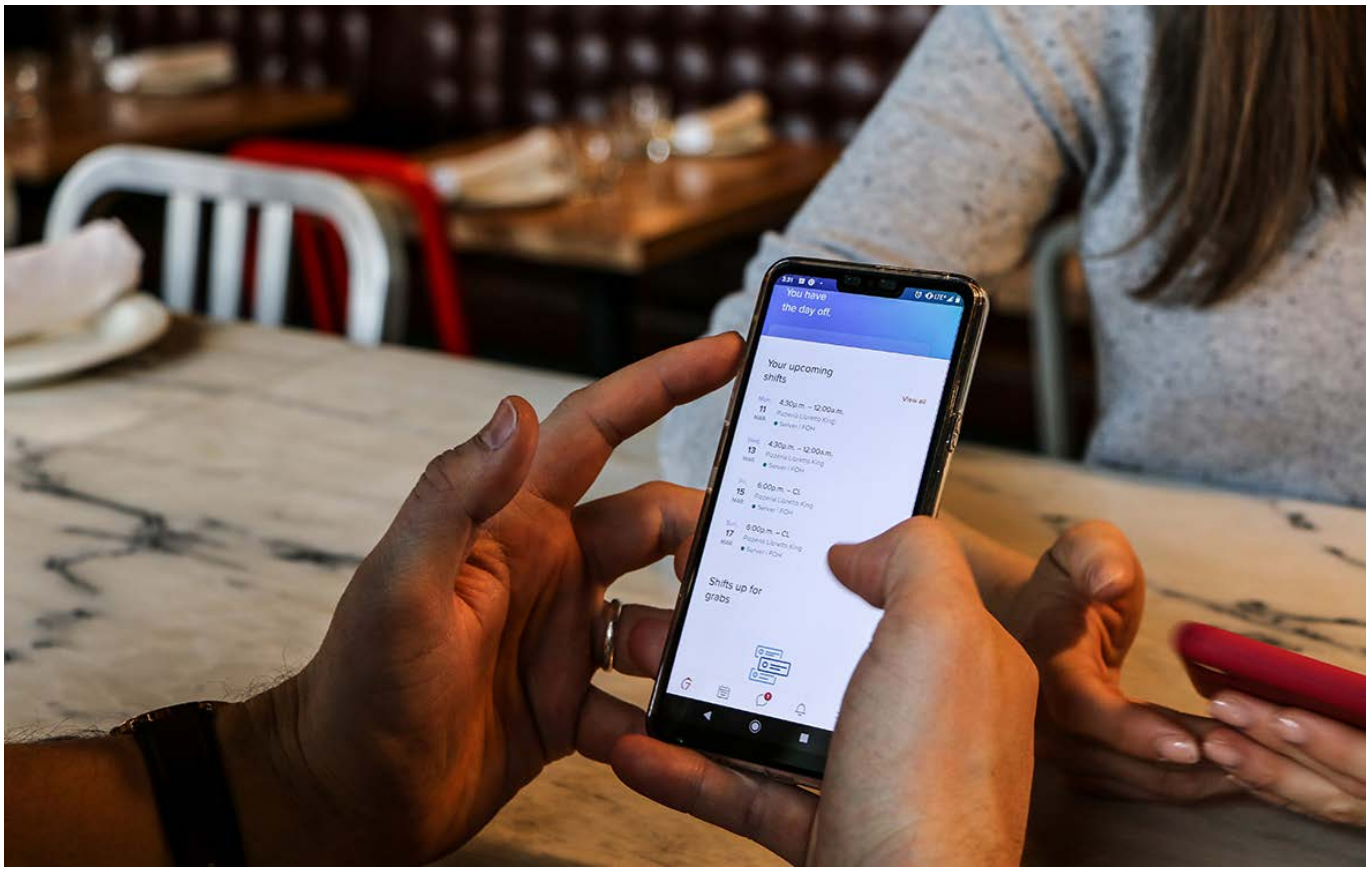
即使通常以這種方式形成研究框架，我們的加拿大同事Tanner Mirrlees也懷疑中國是否是美國的重要競爭對手。他強調美國不僅擁有最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其數位技術和文化產業在目前的規模、範圍，和利潤方面也都遠遠超過了中國這個競爭對手。

我們親愛的同事MandyTröger提供的最後一篇文章，將教導我們一堂歷史課，有關德國重新統一後媒體制度中，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t)轉變的歷史。1990年的春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裡立場較自由、民主的東德新聞圈所採取的無數新舉，很快地就被少數為自身利益建構市場形式的西德政治、經濟團體所壓垮。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歷史中具民主潛力的媒體基礎建設，如何屢屢受到私人經濟利益所破壞。■

來信請寄至：
Marlen van den Ecker <marlen.van.den.ecker@uni-jena.de>
Sebastian Sevignani <sebastian.sevignani@uni-jena.de>

> 連結傳播與勞動：數位剝削

Marisol Sandoval,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國、**Sebastian Sevignani**, Paderborn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Jena, 德國



在分析媒體與傳播時，勞動的角色經常被過度強調。
攝影：7shifts/unsplash.com.創用CC。

批判性媒體(critical media)和傳播社會學(communication sociology)面臨著理論和實踐上的兩難困境：對受到馬克思式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所啟發的批判社會理論來說，生產活動是理解社會轉型推動力的重要關鍵，而傳播和媒體等議題往往不被重視。另一方面，批判性傳播研究分析了意識形態和媒體效應，但往往忽視了勞動議題。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著名學說區分工具性行動(instrumental action)和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為社會生活(social life)中兩個獨立領域，似乎不僅困擾著主流媒體社會學(media

>>

sociology)和傳播研究,也限制了批判性的傳統。在數位化的時代裡,這大大地侷限了我們對媒體和傳播的理解。因此,我們主張採用批判性人文主義研究傳統上的綜合研究取徑,提出三種傳播和勞動在實踐和理論上相交織的情況。

> 媒體界的工作環境

連結傳播和勞動的第一種,也是最明顯的方法是,認真思考全球規模內支撐當代媒體文化的工作條件。在批評者很正確地描繪出工作/勞動是媒體和傳播研究的盲點之後,過去十年中的許多研究已經調查了包括新聞、設計、時尚流行、媒體和藝術在內的一系列媒體及文化部門的工作環境。 這些研究顯示,圍繞在這些行業的精英領導體制(meritocracy)、年輕、開放、創造力、自主權和自我實現的道德觀念背後,是種族、階級、性別、危險合約、無償勞動的不平等結構,還有超時工作、工作壓力、焦慮、自責、競爭和個人主義的文化。

縱觀全球文化生產的供應鏈,可以發現媒體文化與物質生產結構上第二個更為深層的連結面。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產業工人在世界各地的製造工廠中,組裝電腦和電子產品,我們將無法想像現代的媒體文化。對電子製造業的有力研究顯示,現代數位文化在結構上得以維持,是有賴於延續類似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的工作條件。除了一些醜聞,例如蘋果公司(Apple)的供應商富士康(Foxconn),在2010年發生的一連串工人自殺事件之外;這些工人的現實日常很大程度上仍隱藏在,強調輕巧和創新的現代產品、廣告活動的光鮮外表之後;例如,將記者、設計師和藝術家看作工人,同時又將電子製造業定義為工業和傳播勞動。這表明了媒體、藝術和傳播絕不僅僅是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al)的現象,他們已深深融入資本主義式經濟和剝削結構中。

> 以傳播進行生產

第二種情況裡我們可以主張說,人們為了生產必須進行溝通及合作。每個生產都在溝通和中介的生產關係中。在這部分,媒體社會學及傳播社會學與勞動社會學互動,針對勞動是如何被組織和控制進行研究。(新)媒體和通訊技術,例如:電子郵件、智慧型手機、數位平台,創建了一種始終在線(always-online)的文化,有助於延長工作時間,並將新的、通常是無償的勞動形式整合進價值鏈(value chains)中。此外,為了資本的動態利益,他們也透過增加工作場所中與公司之間的勞動分配,與重組的效率和彈性來加強勞動。就特定的勞動力來說,像是Slack之類的媒體應用程序,支撐了逐漸朝向自動化、對話導向和探索形式的工作形態的變遷發展,從而將傳統管理職務轉移到方案工作者和知識工作者身上。接著使用各種形式的演算反饋應用程序和評估工具,來確保擁有傳播生產方式的人,仍可以控制和指揮這種「自動」的傳播合作工作。

> 傳播即生產

將傳播和勞動聯繫起來的第三個選項有點違反直覺:把傳播本身看作是工作和生產。如果我們假設傳播和勞動具有相同的結構,並將二者視為客體化的活動(objectifying activity),整合到共同的框架之下,那麼這將變得合理。人類合作地使用工具、(原始)材料來生產物品,並在遭遇物質世界主權的抵抗時,發展並提升自己的主觀性。這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Marxist anthropology)的出發點,認為人類是積極的、客體化的、恰當的、會學習事物的社會生物。傳播並不是將一個人的能力客體化為物質對象,而是透過傳播手段,對符號、象徵進行勞動(Raymond Williams),也就是透過其他符號、象徵、媒介去產生訊息——「in-formare」一詞完美地表達了這一點,其拉丁語起源中具有「形成」或「使人印象深刻,並告知他人」的意思。必須挪用或解碼客體化的符號或編碼意義(encoded meanings,此詞出於Stuart Hall與英國文化研究),才能發生這一點:傳播並不是構建了物質世界,而是構建了傳播者自身和其他主體的心理調節。人們只能透過對符號勞動進行傳播溝通,而每一次互動即使是最立即的互動,實際上都是由這個象徵性的物質世界所中介。

例如,思考一下一些獨佔的社交媒體平台,例如:Facebook、Instagram、微博(Weibo)、Snapchat,TikTok等,其中被誘拐進入平台的用戶。他們在平台給予的框架內,積極地進行通訊交流,但同時也剝削了產消合一者(prosumers)。他們傳播通訊物化的對象不

>>

斷將數據痕跡留下，並在他們以監視為基礎的商業模型中的社會媒介資本裡增值。一旦沒有網絡用戶的通訊活動和他們物化下的處分權(expropriation)，就不會有商品可以出售給廣告業，也不會為商業社交媒體帶來任何利潤。在勞動／傳播與資本之間這種不平等和剝削性的社會關係中，資本讓我們更努力，更密集地使用數位媒體。 資本引導我們通訊傳播的行動朝向廣告和消費主義發展，用戶活動因此被納入資本之中；社交媒體資本是一種「死亡」的通訊傳播行動，由富有的社會階級控制以進一步剝削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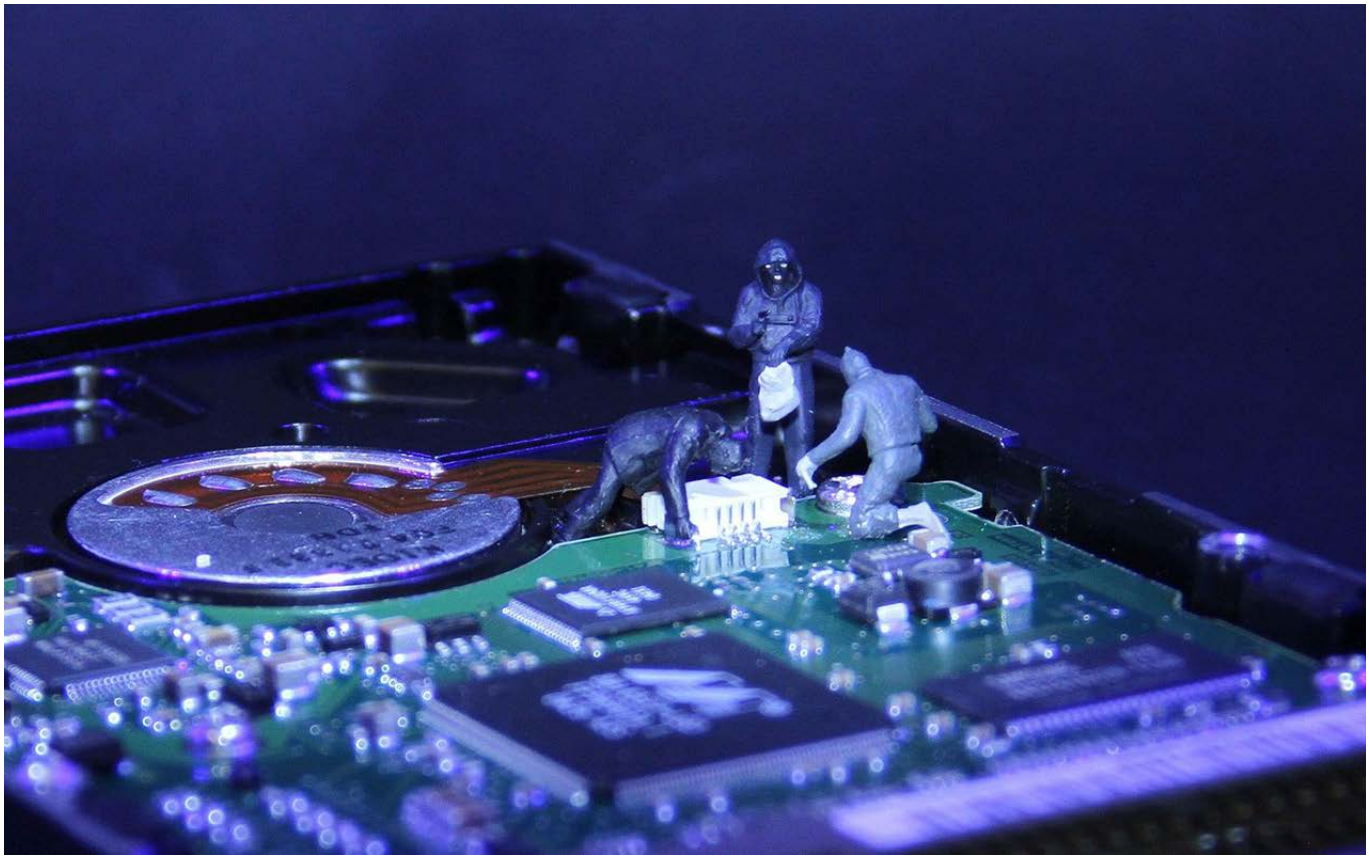
然而，社群媒體資本背後的利益不僅利用了傳播通訊，複製出有利於自身的不平等社會關係，同時也擴散到了更普遍的數位異化形式。在一個經歷我們通訊傳播活動下的大數據和演算法時代，如果不深切地挑戰數位資本主義下潛在的政治經濟，就很難維持、甚至想像一種人道化資訊的自我決定形式。而對傳播客體的剝奪(剝奪傳播對象的權力)及傳播通訊活動的異化，已經使我們成為數位時代中的對象而不是主體。

藉由將媒體文化的分析擴展到媒體內容與效應之外，文中提出的人文主義整合取徑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掌握傳播性資本主義的複雜性，並批評全球文化勞動的不均衡分佈。 同時也使我們能夠注意到，從全球媒體資本下剝削和異化的共同經驗中，團結時刻出現的可能。探究全球資本主義中各種矛盾現象如何形塑通訊傳播和勞動的形式，以及它們如何促使變遷發生，仍是媒體和傳播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要繼續進行的重要課題。■

來信請寄至：
Marisol Sandoval <marisol.sandoval.1@city.ac.uk>
Sebastian Sevignani <sebastian.sevignani@uni-jena.de>

> 自動化與資本主義

Mark Andrejevic，莫納許大學，澳洲



自動化：創造一個為人類服務的物質世界？
攝影：Franck V./unsplash.com.創用CC。

作為一個抽象概念，「自動化」 不受社會關係的束縛，並形塑了一個，只以服務人類為目標的物質世界想像：房屋、工廠依循著人們的需求設計並運作，當走過自動門，空間中便立刻有音樂播放，甚至跌倒時，也會有東西主動接住我們。然而實際身處於當代社會關係中，自動化的物質形式卻更像是某種反烏托邦的、近乎於異化的化身。我們如今知道，自動化系統更構築了我們的資訊環境，例如平台上串流的音樂、充斥我們信息流的新聞、顯示於搜尋結果的無數筆資料等等。；我們也知道，自動化系統經常被用於提升我們的工作環境與表現、個人信用，甚至影響我們的人生走向。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這樣的現象何以被自動化系統達成。

由於我們正嘗試為自身建立一套互動的基礎設施，自動化對於社會領域的發展日漸重要。也因為其自動生產出的數據與資料龐大無比，我們只能透過自動化處理的方式以更好地利用這些資訊。隨著世界受到數位資訊的重整與配置，自動化必然將隨之而起。

因此，對於媒體研究者而言，自動化如何以資本為優先、並因其而改變形式，將會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再加上不久之前，自動化系統曾被譽為

>>

民主與大眾賦權的先鋒，這個問題更值得受到關注。

互動（interactivity）一詞的使用率在千禧年左右到達高峰，並在之後開始逐年下降，被自動化的發展「前景」逐漸取代——這並非巧合，其也正是我們要處理的問題。這並不是一個新出現的問題，事實上，在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中，這樣的主題反覆出現，並持續對抗著資本主義。近幾年來，劍橋分析公司的事件引起大舉波瀾，反對「監視資本主義」的聲音也逐漸壯大，然而若要產生實際的影響力，我們便應該重新以政治經濟的權力結構為焦點。除此之外，身處於媒體的脈絡中，自動化系統對於資訊環境的形塑，也應是首要關注。我們該問的不是要不要自動化，而是如何自動化。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將自動化的邏輯，放置於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權與積累的條件下討論。考慮到科技的發展速度，其中一個思考的切入點是去探究形塑自動化做為鞏固權力、加強控制的無數種方式背後的運作邏輯。以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便能追蹤最近的這些發展有何連結，並確認未來將朝何處前去。這樣做的目標當然並非直接反應，而是要對未來進行預測：我們應該設想的，是如何以共享優先為科技發展守則，而不是向下一帶的祖克伯格或貝佐斯舉手投降。

我們也許可以先從目前條件下，自動化互相扣連的三個特質出發，並檢視其內涵：搶佔先機（preemptive）、無框架性（framelessness），以及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

搶佔先機指涉的是針對自動化資料收集與採集（mining）願景的運用，以及對於風險的管理。這樣的邏輯其實並不陌生，例如亞馬遜網路書店早就透過慾望的預測，得知顧客會想購買什麼產品；警察則透過預測分析建構想像，在犯罪發生之前便予之擊潰。新的自動化保全系統則能夠在某些具攻擊性的機關已經啟動、卻還未造成破壞時，便預知其造成的衝擊。自動化搶佔先機預測的時間間隔僅以毫秒為單位，僅需要短短這幾毫秒，系統便能搶在衝擊發生前做出應對。

在上述這些例子中，搶佔先機都需要藉由感知與自動化數據收集來達成。透過全面性的數據收集器和感應器，才有可能搶在顧客與罪犯之前，盡可能地掌握清楚他們的相關資訊，以預知他們的想法。唯有將一切收為己有，搶佔先機的目的才得以完成，這凸顯出其與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的全控監測，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無框架性同時描繪了以數位化的形式強化世界的所有一切、不留任何一部份地的企圖，以及持續不斷尋求各種應用數據的方式。在人們發現數據能辦到的事情多麼驚人時，數據關連性的慣用框架便遭到瓦解——例如在網路瀏覽器上填寫求職申請，比起填寫紙本表格反而能更好地預測未來的工作表現；又或著字跡與打電話給母親的次數，開始會影響我們的聲譽。在這樣的情況下，敘述性解釋相較於機器給出的互相關聯性，成為人們看不上的選擇；前者以描述特定變量為何具有相關性來重新加強特定框架，後者則認為要拋棄這些。正如 Chris Anderson 在其報告中所述，「什麼樣的人類行為理論都沒有用，從語言學到社會學都是。忘了分類學、本體論和心理學吧，誰在乎人們為什麼要做出任何行為？重要的是他們做了，而我們如今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確程度紀錄、測量。只要有了詳細且足量的數據，數字本身便是可以說話的。」

根據 Harun Farocki 關於「操作」圖像的研究，我們可以將這一切稱為「操作主義」：資訊是不需被解釋的，因為它作用並產生了結果，而這並不需要解釋。只要你使用了正確的瀏覽器、文件中沒有錯別字，你就能夠獲得工作或貸款。當你符合了操作模式，不管你是誰，都會被逮捕、升職或受到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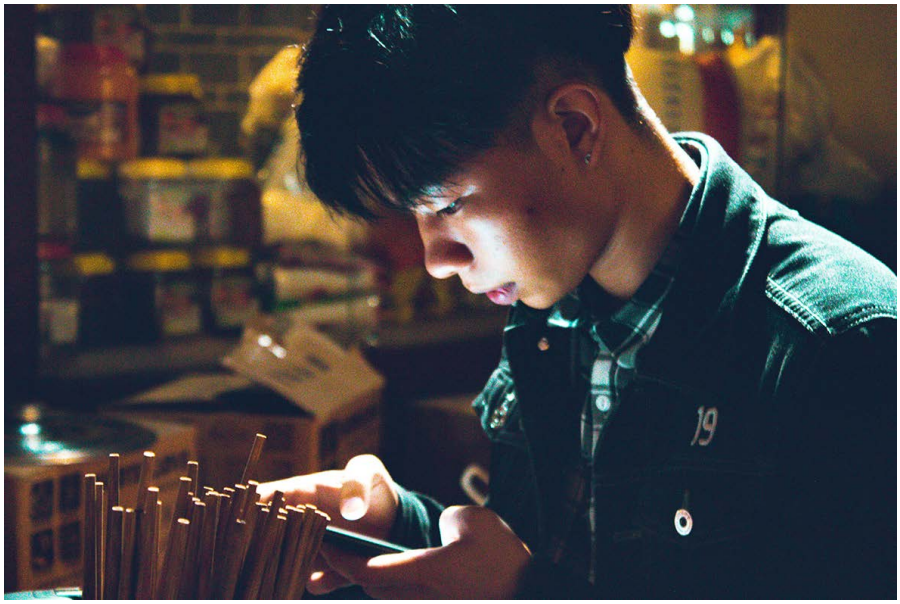
搶佔先機、無框架性和操作主義邏輯，構成並貫穿「自動化」運作過程，從販賣商品時針對性的廣告投放，到殺戮時無人機的對象鎖定，無一不適用。以此邏輯為前提下，擁有掌握數據與處理的能力與權力，便是掌握了更高的權力位階。自動化數據收集需要透過自動化處理，以及自動化回應的設施來達成。與此同時，這樣的邏輯也標示出反抗的可能，人類本身必定具備的有限性，便為其帶來了挑戰。權力的目標是要去掩蓋這樣的事實——無框架的野心事實上是過於宏大且不可能被實現的；這意味著我們我們不可能完美的強佔先機，也無法拋棄對於數據的解釋。■

來信請寄至：
Mark Andrejevic <Mark.Andrejevic@monash.edu>

> 時間性

與中國數位勞動階級的形成

Jack Linchuan Qiu，中文大學，香港



數位科技已經無所不在。他們可以用來控制，也可以用來發起反抗。
攝影：Owen Winkel/unsplash.com. 創用CC。

中國當局透過數位媒體平台、行動定位服務和人工智慧（AI）等技術，大幅地增進社會控制的力道，掌握人民的移動及變遷中的城鄉地理資訊。此篇文章則試圖說明，若是將以時間性而非空間性的觀點，檢視中國數位勞動階級（digital working class, DWC）如何形成與瓦解，可以發現針對北京的控制，事實上正逐漸被削弱。此處的「階級」，同時可以用馬克思與韋伯主義者的角度理解，並分別對應著「革命時代」和「消費時代」。

革命與消費是兩種對立的時間性模型：前者具有破壞性、集體性、反資本主義、前瞻性、英雄主義的和超歷史等性質；後者是連續的、個人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現在論的、褻瀆的和非歷史的——於此分別參考Richard Florida的《The World is Spiky》以及Thomas Friedman《The World is Flat》，將前者稱為「尖時間（spiky time）」、後者則稱為「平時間（flat time）」。

本文之所以會選擇中國的勞工階級為對象，是因為他們相較於其他社會群體，往往生活在更複雜多元的時間性中，因此提供了一個較為廣泛綜合的時間性秩序—多重秩序共存且具內部衝突，使我們得以檢視平時間和尖時間的動態交互作用。

在 Raymond William 的框架中，尖時間和平時間分別處於磁場的兩極，之間存在著各種時間性。這些時間性各自具有殘餘、主導和顯現浮現等性質。平時間被Manuel Castells 稱作「永恆時間（timeless time）」，其主導了DWC日漸數位化的日常生活；尖時間則在其相對破碎的時刻中，潛伏於殘餘、又顯現於變動的力量之中，並在平時間的平滑表面上穿洞。平時間促使勞工追求他人的夢想、生活於原子化環境中，使其遺忘自身的身份能夠形成工人階級的團結；尖時間則協助了集體抗爭以及DWC的階級形成。

尖時間與平時間也有其相似之處。相較於過去中國政權以線性時間為特徵，例如儒家的倒退（regress）、佛教的輪迴轉世、現代主義的可預期進步，尖時間與平時間皆非如此。平時間既非倒退也非進步，更非循環；尖時間是由 Stuart Hall 所說的「無保障政治」創造，其處於進步與倒退的碰撞產生的鋸齒狀邊緣。

>>

尖時間和平時間皆因其共時性而強大。例如2018年全國卡車司機針對中國長途卡車運輸平臺運滿滿發起的罷工，其性質就如同美國西部城市對 Uber 進行的抗爭，只是規模更大、遍及全國；又例如中國每年11月11日的電子商務狂歡節「單身節」，每到這天，各階層的消費者皆沉浸於網購的狂歡之中。由於社會結構所促成的自發性行動，勞工們一年中可能會有360天生活於平時間中，卻會在另外的5天中生活於尖時間。

Judy Wajcman所說的「時間主權(temporal sovereignty)」，指的正是上述這些時間概念的不同向度，例如尖銳、平坦、儒家、佛家、現代主義等，他們具有定義時間性的最終權力。時間以何為基本單位？基本單位之間如何連結？什麼才是有意義的時間整體？

在傳統的時間概念中，儒家預設了超然君主的存在，現代主義的時間性則在中國脈絡下透過國家主義展現，其中包含著國家社會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即便中國共產黨以現代主義的時間性行使統治，尖時間和平時間皆挑戰了國家主導的時間體制，並藉此為非國家行動者創造時間空間，例如企業所對應的平時間，以及激進派的尖時間。

在中國現今世俗化、個體化、流動性增加的情況下，時間性從來都不是靜止不變的。智慧型手機與網咖多少帶來了一些創新，不過考量自二十世紀初中國勞動階級的集體經驗，歷史的延續性仍然是多過其斷裂的。

在多數情況下，勞工必須要依照老闆要求行事，如依循著工廠的工業時間，或是公司營運媒體的平時間。然而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面臨著生存威脅，DWC 會以另一種時間取代原本的時間，而在取代的時間中，勞工是得以主宰時間的。在數位時代中進行停工、暴動、罷工等階級抗爭的關鍵，便是建立尖時間，以此取代原本的時間制度。

平時間的興起是一個以全球為範圍的現象。由人工智慧驅動的內容農場大量製造假新聞、民族主義迷因大肆流行，這些構成了 Adam Greenfield 說的「後人類日常生活」。平時間是一體兩面的：對消費者而言，它應該是「自然的」、受到數據科學和華爾街法則支配的；對資訊技術公司而言，被公司捕獲的平時間成為其私人財產，並在操縱、貨幣化時間的過程中使其成為資本積累的原料。

當這樣的全球性趨勢發生於中國，其國家卻出人意料地退縮。在毛澤東時期，透過學校、大眾媒體、定期政治動員，中國以其強大的國家機器進行時間的國有化；自1992年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共產黨仍然主導著空間規劃，其大型基礎設施甚至出現在歐亞大陸、非洲和美洲。然而，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政府當局似乎未能保持對時間的掌控。

做為一個政黨型國家，中國政府對於主導時間，並非毫無嘗試。然而事情並沒有依照政府所希望的發展，時間的掌控權反而從國家政府轉移至私人企業手中。對勞工來說，沒有任何政府所主導的活動勝過「單身節」這個購物節慶。國家時間幾乎是以一種殘餘的狀態存在。習近平的儀式性展演，使其如神一般的人物形象，都變得微不足道——連一個人群為習近平鼓掌的鏡頭都能持續好幾分鐘。這顯現出現代主義下的國家時間已經被掏空，由平時間取而代之。

2004年對中國的勞工而言，代表著網路革命時代的回歸。陝西、四川和廣東的三起抗爭，突破了地方政府對論壇和部落格的資訊限制，自此之後，掌握了數位媒體的勞工在對抗老闆和政府威權時取得勝利，已經不再是特例。2010年的本田鎖業罷工，以及2014年的裕元鞋廠罷工，甚至是2018年發生的佳士工潮，都是其中的案例。

我最後想要以 Giorgio Agamben 提出的「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以及「順時性時間(chronological time)」這兩個概念之對比來總結。他對這兩種時間性的描述，與尖時間和平時間的對比非常相似。Agamben 提到，「彌賽亞時間並非外於順時性時間，其是順時性時間的一部分，只是這部分會經歷某種壓縮、收聚，並在此過程中完全地改變。」對中國 DWC 來說，彌賽亞時間已經開始發生了。隨著數位媒體的廣泛傳播和平時間的主導位置，尖時間被折疊於平時間的內部，也因此，革命時間的起始往往難以被注意到。革命正是在這種被遺忘的、沒有人注意到的任何時刻中發生的。■

來信請寄至：
Jack Linchuan Qiu <jacklqiu@gmail.com>

> 美中抗衡？
數位科技與文化工業的戰爭

Tanner Mirrlees，Ontario Tech University，加拿大

美國的經濟與文化霸權來到盡頭了嗎？
來源：維基百科創用CC。

從美蘇冷戰，一直到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因經濟蕭條而被迫終止，美國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強大帝國。然而最近，上至美國總統川普、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下至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皆認為中國可能動搖美國對於世界秩序的掌控。美國紐約時報和南華早報，分別以《美國 vs. 中國：無邊際的大國競爭時代》、《美中對抗逐漸升溫，東南亞不選邊站隊的日子將要結束》等標題，將美國和中國描述為勢均力敵的「對手」。不過事實真的是如此嗎？長期以來，美國以的三大結構性力量為支柱：全球經濟實力、軍事霸權、科技與文化的普及。即便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及「軟實力」正逐漸成長，不過中國還不能真的被稱作一個「競爭對手」。2019年的美國，不僅在經濟和軍事上戰勝了中國，在數位技術與文化產業面向上更是如此。

根據富比士的全球前兩千名企業排行，總部位於美國的企業共有575間，中國則只有309間；前20名企業中，有10間是美國企業，中國企業僅兩間。佔據了全球外匯存底與金流的幣種是美元，而非人民幣；美國的名義GDP更是以19.39兆美元，勝過了中國的12.24兆美元。在國防預算上，中國是1850億美元，不敵美國的 6846億美元。美國的這筆龐大資金，由全球最大的武器生產／出口商接收，包含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和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等公司。除此之外，數百個美軍基地遍佈於全球，從韓國大邱空軍基地蔓延至德國斯潘達勒姆空軍基地，最近甚至於印太地區擴張，以包圍和遏制中國。相較之下，中國的全球軍事工作顯得微不足道，僅有一個外國基地設置在吉布地（Djibouti），距離美國還很遠。

作為美國經濟、軍事實力的基礎，其數位技術與文化產業的規模、影響力、利潤和實力都比中國龐大許多。在全球154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有65家是美國公司，20家是中國公司。前十名中有八家是美國公司，包含蘋果、微軟、Alphabet-Google、英

>>

特爾、IBM、Facebook、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和甲骨文(Oracle),騰訊控股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中國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兩家電信公司分別是美國的 AT&T ,以及 Verizon,第三大的才是中國電信公司。20 個最常被14歲以上的人使用的網站,皆設置於矽谷,包括壟斷了搜尋引擎業務的 Google、社群網路巨擘 Facebook、影片平臺YouTube、數位微型部落格推特、百科全書網站 Wikipedia、娛樂串流平台Netflix、電郵網站Yahoo 和 Outlook、攝影共享平台 Instagram、論壇 Reddit、色情網站Pornhub 和 Xvideos等等。中國的網路公司確實正在成長,但目前只有世界上訪問量最大的兩個網站——百度和 QQ。

全球票房並非由中國,而是由好萊塢五大製片公司——迪士尼的華特迪士尼和20世紀製片、AT&T-WarnerMedia的華納兄弟、Comcast-NBCUniversal的環球影業和ViacomCBS 的派拉蒙影業所支配;好萊塢2019年的總票房由北美票房的114億美元以及國際票房的311億美元,創下了 425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中國政府藉由限制其大多數電影與電視節目是「中國製造」,以保護並促進其國內娛樂產業的發展。我們不能說中國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但中美之間的文化貿易關系確實是不平衡的;好萊塢電影每年都能在中國大賺一筆,中國電影卻很少在美國院線上映,也無法獲得相近的票房與利潤。2019年最賣座的電影《復仇者聯盟2:終局之戰》在中國創造了30項票房紀錄,中國大片《流浪地球》在美國卻一個票房紀錄也沒有——簡言之,中國的全球娛樂產業完全無法匹敵好萊塢的跨國利潤和文化吸引力。

矽谷和好萊塢每年為美國GDP貢獻數十億美元。數位媒體平臺滿足了資本主義創造消費者,並誘使其繼續購買大宗商品的需求。作為全球最大的數位廣告商,Google 佔全球廣告支出的 31.1%,即1037.3億美元;Facebook 以673.7億美元的淨廣告收入位居第二,第三名才是中國阿里巴巴公司的 292億美元,第四則是亞馬遜公司,約141億美元。好萊塢的電影和電視節目製作,也服務了資本主義的廣告需求。這些產品的核心是體驗與文化商品,經製片公司製作後賣給分銷商,再分發給各種影像傳媒展覽的參展商。每部好萊塢作品的推廣費用,約落在2000萬至1.5億美元間。全球的廣告商也會向好萊塢付費,讓其在影片中置入商品。《蜘蛛人:離家日》便以2.88億美元的廣告收入,創下品牌置入的紀錄,讓你在觀賞蜘蛛人大戰神秘客的同時,還能享受奧迪、百事和聯合航空公司的商品置入!《怪奇物語》第三季則以可口可樂、漢堡王和肯德基的置入性行銷,取得了1500萬美元的廣告收益。

美國數位技術與文化產業的運作,除了受到資本主義邏輯的驅動,也與美國的地緣政治企圖有關。為了確保矽谷和好萊塢在其他國家的盈利,美國國務院推動文化和數位自由貿易,以嚴格的知識產權政策;美國國家安全局則利用大型科技公司的「監視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模型監控全球人口,並將其活動以數據形式保存,以分析、預測其可能對美國構成的威脅。美國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辦公室在新舊媒體上開展親美運動,以鞏固美國的「軟實力」。美國國防部將網路和社群媒體作為「網路戰爭」的「武器」和「戰場」,並與亞馬遜、谷歌和微軟等公司簽訂合同,進行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的軍事研發。美國國安的所有相關部門,都與其文化產業環環相扣,甚至經常協助好萊塢製作以國安為主題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如中央情報局便協助製作一部以冷戰題材的電視劇《美國人》,前特務 Joe Weisberg 也是編劇之一。國防部與好萊塢共同創造了許多「軍事商品」,例如《捍衛戰士:獨行俠》、《驚奇隊長》和《變形金剛》。

關於20世紀和21世紀,美國數位技術和與化產業的資本主義邏輯,如何與美國國家安全的地緣政治行動之間互相融合,在我參與編輯的著作:《心與礦:美國帝國的文化產業(Hearts and Mines: The US Empire's Culture Industry)》(2016),以及《媒體帝國主義:連續性和變化(Media Imperi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2019)中,有更為詳細的內容。總而言之,美國的國家機構、數位技術和文化產業正建構、保護、促進一個由同盟國組成的全球體系,其由美國軍事安全體制監管,受到矽谷和好萊塢的支持,並透過美國的流行文化和媒體平臺向外擴散。中國的確正不停擴展其軟實力以及數位軍火庫,也試圖創造文化影響,但現在的中國仍然不是美國帝國的對手。■

來信請寄至:
Tanner Mirrlees <tanner.mirrlees@uoit.ca>

> 自由市場會促進後社會主義的新聞自由嗎?

Mandy Tröger,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德國

1989年9月於柏林的示威遊行。
攝影:Peter Zimmermann/Bundesarchiv。

針對1990年春季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新聞市場的發展,西德聯盟雜誌Publizistik & Kunst 稱之為「淘金熱」,而報紙 die tageszeitung 則認為這提醒人們「早期的資本主義」。然而,西德的政治經濟團體為自身利益建立的市場結構,卻深深阻礙民主媒體改革。

僅五個月前,1989年11月,成千上萬的東德人上街抗議國家的無情鎮壓,並以建立自由民主的媒體為訴求。這些抗議活動推翻了柏林圍牆,並在媒體上掀起一波逐步改革的浪潮。最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1990年10月3日加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使德國統一。有關統一已有很多研究,而過渡時期也已過去,這篇文章強調,早在1990年五月,德國媒體市場已經有效整合。

> 改革

1989年11月,最初的媒體改革目標是打破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的資訊壟斷。當時SED持有東德報紙總產量的70%。早在1989年12月,東德部長理事會就批准一項決議,支持反對派團體平等的接觸媒體。不久後,在1990年2月5日,《意見、資訊與媒體法案》禁止審查制度,並宣布新聞媒體圈擺脫政治經濟壟斷,因而成為公開辯論的開放平台。這意味著東德統治下的每個人民與法人都有權利發行、印刷與分發媒體。

隨後,新興報業公司爆炸式增長:光1990年2月就已成立16家報紙;1990年7月則為100間。在一個只有一千七百萬人口的國家,這波報業成立的浪潮代表著結構改革與民主參與。同時,老牌報紙宣布將獨立於政治與進行內部改革。此外,在新聞編輯室、報紙與致編輯的信中開始對新聞界真正自由地進行辯論。

同時,東德設立幾個機構專門監督媒體改革。例如,無黨派基礎的媒體控制委員會 (Media Control Council, MKR)與媒體政策委員會 (the Ministry of Media Policy, MfM)在1990年4月成立。媒體部長Gottfried Müller在1990年5月表示,他們的目標是確保"通往媒體自由的培育轉化",而非「隨意地採用或模仿

>>

西方國家的模式或概念」，其目的是為新聞自由挖掘新模式。

> 市場接管

在進行這些政治改革措施的同時，西德媒體公司已經開始擴展東德市場。早在1989年12月，出版商就在東德發送他們的出版刊物，原本零星的出口很快就轉完系統化。至二月中旬，西德內政部 (BMI)已經認為媒體業有監管的必要：因為他們未繳稅，也未明確定價。但是，BMI“明確認可這些「法律上灰色地帶的出版行為」，因為能夠確保資訊流通，進而去影響1990年3月東德第一次自由選舉，這場選舉由西德政黨提供大量資金。由西德市場利益所形塑的媒體業轉型，於此奠下政治基礎。

1990年3月5日，主要出版社Springer，Burda，Bauer 與 Gruner + Jahr (G+J)開始有系統地進口。他們設立自己的專屬系統，將東德分為四區，主要發行自己的出版刊物，並充斥整個東德市場。然而，這違反聯邦法律，在東德的政治與公民機構亦引發恐慌。因為該計畫在選舉前兩周實施，東德政府來不及採取行動，嘗試監管都被拒絕或忽視。

選舉後不久，這些出版商的目標轉為透過使用掠奪性訂價來獲得競爭優勢。這項虧本生意的目標是為贏得未來的讀者。然而，這排除掉無法負擔得起這樣價格的西德小型出版商，並給東德報紙施加更大的壓力：過時的印刷技術、缺乏紙張與不可靠的發行基礎設施使其難以競爭。此外，東德在1990年4月1日終止對報業媒體的補貼。大多數報紙的價格翻漲二至三倍，並迅速轉往廣告，使得西德媒體的專業不可或缺。不僅需要資本投資外，還使東德在早期發展報業時產生對西德的依賴。

> 兩國一市場

至1990年4月，所有東德報社都與西德出版商進行合資談判，以在東德獲得競爭優勢。主要對象是14間前東德地區報紙，在各自區域有著半／準壟斷的地位。這些報業簽訂正式的合約意向書。但是，事實上，西德出版商建立的商業關係，範圍從收購報紙商到印刷報紙，還包含股權投資。直到1991年4月，這些合資企業才被德國政府的信託機構 (Treuhandanstalt, THA)轉變成合法的合約。THA 毫無改變的將原本國有的媒體業交給西德的主要出版商，使得這些出版商很快就進一步鞏固市場。

> 夢想幻滅

最終的結果是媒體聚集：1990年成立的120種報紙，兩年後僅有大約50家出版社與65種報紙。至1992年11月，剩下35家出版社與50種報紙。對歷史學家Konrad Dussel而言，這是聯邦政府「反對任何實驗」決定的結果。這也意味著1989年民主夢的消亡。對於如何基於東德的經驗重新思考新聞自由、思想與倡議都已經超出限度。這使過渡時期失去機會之窗，而兩德統一僅是西方政治經濟秩序的擴大，而曾擁有主權的東德，媒體卻從未有好發展。■

來信請寄至：
Mandy Tröger <Mandy.Troeger@ifkw.lmu.de>

> Juju：資通技術的非洲啟示

Francis Nyamnjoh，開普敦大學，南非

Arbu 繪。

我從小在中西非長大，在我們的文化中，自然、超自然、人類、人類的行為與成就等一切事物，皆被認為是不完整的。「事物普遍是以不完整的形式存在的」——我們相信越早認知到並接受這件事情，對一切來說都會是比較好的。我們認為由於這樣的不完整性，即便在當下看來，人們在形式與內容上可能呈現出個體化或群體化的性質，事實上卻並非如此。人以外的其他事物也是這樣的。不完整性與現實的本質，便是流動性（Fluidity）、存在的混

>>

合性(compositeness of being)，以及同時以整體或片段呈現的能力。更進一步來說，互相連結與互相依賴的行為，在中部與西部非洲是被推崇的；人們認為不管是人與人之間、人與超自然的事物之間，都應該以這樣的模式為互動基礎。

> 關於不完整性

在「不完整性」的概念下，中西非的人們期望能夠透過與他人的關係強化自身的存在。人們會利用想像力與創造力，以特定具有「魔力」的物品，作為自然與超自然力量的媒介，藉此將自己的存在於關係與互動中延展。這裡說的具「魔力」的物品，以現代的說法來說就是「科技(technologies)」，不過在中西非的在地語彙中，我將這樣的魔力物品以juju一詞來粗略地指稱。這樣的宇宙論與存在論，形塑了中西非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這些概念的實踐。然而至今仍有許多人將這類行為以巫術、黑魔法、邪教、迷信、太過原始等詞彙來描述，不管在非洲的學生、觀察人員，甚至是非洲人自己舉辦的活動中，都可以發現這樣的情況。矛盾的是，對於那些將現代化與發展視為零和遊戲的人，即便是被當代科學革命奉為圭臬的資訊與通訊技術(ICTs)潮流，也無法成為能夠影響這些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因素。

當然，有些人拒絕承認自己對其他事物帶有虧欠，懷抱著征服與支配的野心，不過在這裡我們先撇開這些事情不看：未來應是站在這些被看不起的信仰，以及由不完整現實帶來的生活實踐一方的。如果將自然狀態下的普通人類視作不完整的，不管是透過社會關係或是借用科技來強化自身存在的行為，都難以真正使其完整——這些行為反而指出了他們的混合性，以及對其他人類、自然超自然等他者的虧欠。不完整是一個持續性的狀態，當面對所有人們還無法完全掌握的延伸形式，為了修復自身的不完整狀態而尋求自我延伸只會一再地認知到自身的不完整。甚至，大部分的延展並非所有情況中都能夠完整地發揮作用，某些時候延展反而會削弱個體對自我完整度的認知。完整性其實只是一種幻想，其使人產生毫無意義的競爭與零和遊戲心態——這促使我們探索、思考，並試圖追求一個開放式的、互相連結的、流動和共生的世界。在這樣的理想中，沒有人能夠壟斷權力、沒有人是無權的，人與物將相輔而存。

強調互相連結與依賴，將促使我們系統性地消除自身追求優越的零和心態，並最終使我們接受不完整、接受其作為一種正常的存在(being)狀態，甚至作為一種成為(becoming)的狀態。

> 數位科技作為juju

關於那些無形的力量，就如Chinua Achebe 在其《神之箭(Arrow of God)》中所述：「當我們看到一隻小鳥在道路中間跳舞時，我們必須知道它的鼓手就在附近的灌木叢中。」人類為了能夠宣稱自身擁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神性，必須追求藉由不凡的活化劑—— juju ——以提升平凡自我的方式。在中西非，人們普遍認為自身的神性可以透過包含巫術、藥劑等juju獲得增強，而這類物品通常會由先知或具靈力者(這類人士在不同脈絡下會有不同的稱呼)特製而成。

因此我認為ICTs或數位科技與juju事實上是相似的。在中西非地區中，人們對於不完整性、混合性、同時於所有地方存在的能力抱持的信念，反映出一件事——要如何更好的去理解與運用當前資通技術的創新進步，還有許多可以從過去學習的部分。作為數位人文學科的學者，我於此誠摯地邀請你一同深入了解這個議題。數位技術使得人類與事物得以在不在場的情況下存在，或著在沒有實際存在的情況下存在，這與那些被稱為巫術和魔法的事物其實並無不同。這樣的信念帶出了一個具有無限可能的世界，在此世界中，一個事物能夠同時有多個存在，並且有著重新定義現實的永恆力量。中西非的大眾世界是一個具有彈性、流動性和不完整性的世界，卻被殖民國忽略，並持續於今日被現代主義者蔑視，在這個世界中，時間與空間是不能阻礙真理與其微小複雜性的。網路、手機、智能手機等資通技術的出現，帶來了即時性與可觸及性等「魔力」，並使人們更加傾向出現自戀、自我放縱和保持形象的行為，也正是因為資通技術的發達，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瞭解才得以進展。不同於二分法的思維，中西非地區透過創造性想象形成自我延伸的傳統，假定了一種互相連結的本體論——這也許會是將人類與資訊通訊技術之間的交織性理論化的有效途徑。

>>

我認為 juju 是關於自我活化與自我延伸的一種科技，其能夠賦予我們一些原本沒有的能力，我們得以完成原本難以觸及的事情，並使我們不再只是「平凡」。如果經過良好的培養與磨練，我們的身體是有著成為juju，並取得非凡成就的潛能的。但即便是經過技術性訓練與規訓的、程式化的身體，也會遭遇到無法依靠自身跨越的困難，需要透過自身以外力量的幫助才得以達成。總而言之，我們的身體有著成為 juju 的潛力，但最終仍需要額外的 juju ，以增強我們本身的行動。

Juju通常會需要透過複雜的連結網絡來運作，這個特性凸顯出其謙卑的性質，並且制衡了傲慢傾向的壯大。就算是將較為「科技」的 juju ，如電腦、手機等行動設備裝置於自身，也無法保證他們不會突然失效。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懷抱著juju信念的中西非男人與女人，並不排斥將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現代科學化技術，與他們的「非洲電子產品」一同使用。透過這樣的方式，他們得以同時與村內、村外甚至其他洲的客戶互動，透過將傳統與現代的 juju 融合，進行自我活化與延伸。

依賴於juju、符咒、巫術或先知也許被視為原始、不合理的行為，但是面對自身的不完整性，這些便是我們獲取能動性的一種方式。以這一點來說，就如前面的段落中我提到的，juju與那些被認為更加現代、科學、理性的科技並沒有什麼不同；照片、電腦、網路、手機、智慧手機、大眾媒體、社群媒體、書籍、電力、洗衣機、人工智能、核武器，都只是一種自我延伸。不管你身處於法國、加拿大或比利時，只要在Google搜尋「Marabout公司」，不僅可以找到塞內加爾、馬利或尼日的 Marabout 官方網站和聯系方式，還可以看到他們的辦公室、代理人、電話號碼和行事曆。以喀麥隆為例，占卜師會用電腦、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聚集離散的喀麥隆人，對於他們由於破碎的關係而產生的痛苦，進行占卜或解答。

> Juju：必要之惡？

於數位科技與演算法的時代，我們見證軟體工程師驚人、詭譎的強大力量正不斷增長。如今透過木馬程式的安裝，駭客能夠在遠端將我們的加密訊息破解，甚至能在我們不知情的時候打開麥克風和鏡頭。這些製造木馬程式的人，事實上無異於中西非叢林灌木中的靈媒，他們鼓勵客戶或信徒陷溺於觀看他人全貌的、狂熱的權力之中。

就如同生命本身便充滿不平等，以及不平等所構築的階層，juju也存在著相似的情況。如果有人擁有較為強大的juju，它便能比起其他人有更強的能力去看、聽、聞、感知到那些有形與無形的事物，也就更容易能夠影響並控制自身以外的人事物。Juju可以單獨使用，也能與其他juju組合使用，以最大化其效果。如果你有擁有一個強大的juju，就算不在場，也能有效地對其他人產生作用，無論那樣的作用本身是好是壞，是出於愛還是恨。在社群媒體時代，擁有應用程式和聯絡資訊的智慧型手機，便能很好地呈現出這點——作為時下的強大 juju 之一，智慧型手機使人們能夠使用熱點、藍牙等功能，並滿足日益增長的社交需求。

即便生活本身便具矛盾與可控制的性質，如果沒有juju所帶來的創造性，以及因其而生的冒險與刺激感，生活本身將不再有難以預測的變動性，最終成為標準化、重複的平凡；個人與社會將失去即興發揮和自我創造的能力，並且不再有創造性的理念出現。這凸顯出juju對於社會與社會關系的重要性：個人和集體都會試圖使用juju 影響、控制人與事物；沒有juju的人們，將無法克服逆境。

Juju 的普遍性，也正顯示出分散於許多個體身上的力量，雖然容易出現，卻也很容易於轉瞬間消逝。不管本身多麼強大，人們仍總是尋求自身身體上的延伸及感知，並試圖以 juju ——就如科技與技術一般——對自己的存在進行增強。這使我們得到啟示：人類所需要培養的特質，應是同時能包含「內部」與「外部」的。■

來信請寄至：
Francis Nyamnjoh <francis.nyamnjoh@uct.ac.za>

> 在菲律賓「做社會學」

Filomin C. Gutierrez，菲律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以及ISA偏差行為委員會(RC29)、女性、性別與社會委員會(RC32)成員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SOCIETY

本期的《全球對話》呈現來自菲律賓社會學學會（PSS）成員對不同議題的討論，包括都市化及治理、LGBT運動、毒品戰爭中的暴力行為、在貧窮社群裡實踐公共社會學，以及民答那峨島的邊緣化。分別來自呂宋島、維薩亞斯群島和民答那峨島三個獨特的島群，他們將討論彼此的研究興趣，並思考菲律賓社會學者今日所面對的問題。

Louie Benedict Ignacio處理了菲律賓的都市化議題，他指出馬尼拉都會區的都會化動態過程。馬尼拉都會區就是構成國家首都區的數個週邊都市。隨著都市的貧困加劇、貧民窟增加，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ies）興起的成因已經從提供經濟安全轉變為確保特權住戶的人身安全。Ignacio提出的都市化危機，不只伴隨著資源及交通管理的共同問題，還有社會分化及治理衍生的問題。

John Andrew Evangelista研究了如何運用酷兒視角來理解菲律賓LGBTQ運動中各團體背後的意識形態差異。依循著多元的意識形態，人們針對不同議題提出了各種主張：例如認為應倡議反歧視立法，並改變現有經濟體系，或是認為同志遊行應著重於派對性質。他認為，在建構LGBTQ運動的歷史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及衝突空間，顯示了運動各個環節的差異是歷史產物，而非基於對立的利益衝突。

Gutierrez介紹了毒品戰爭中的暴力行為，該事件在菲律賓引起了數千位「毒癮人格（drug personalities）」死亡，並出現了不同調的敘述。菲律賓公眾對於反毒品運動的支持，和對於人權侵犯及被補毒品嫌犯針對警察暴力的論述，兩者相互牴觸，但也確認了後者視該運動為毒品問題解決方案的看法。隨著話題逐漸依不同視角開展出多元的論述，社會研究者的觀點必須超越以下觀點之間的爭論：刑法民粹主義——種主張對基於公眾情緒的犯罪行為，施加懲罰性措施的觀點，以及刑法菁英主義——種給予科學的或專家的意見特權，並認為公眾情緒過於簡單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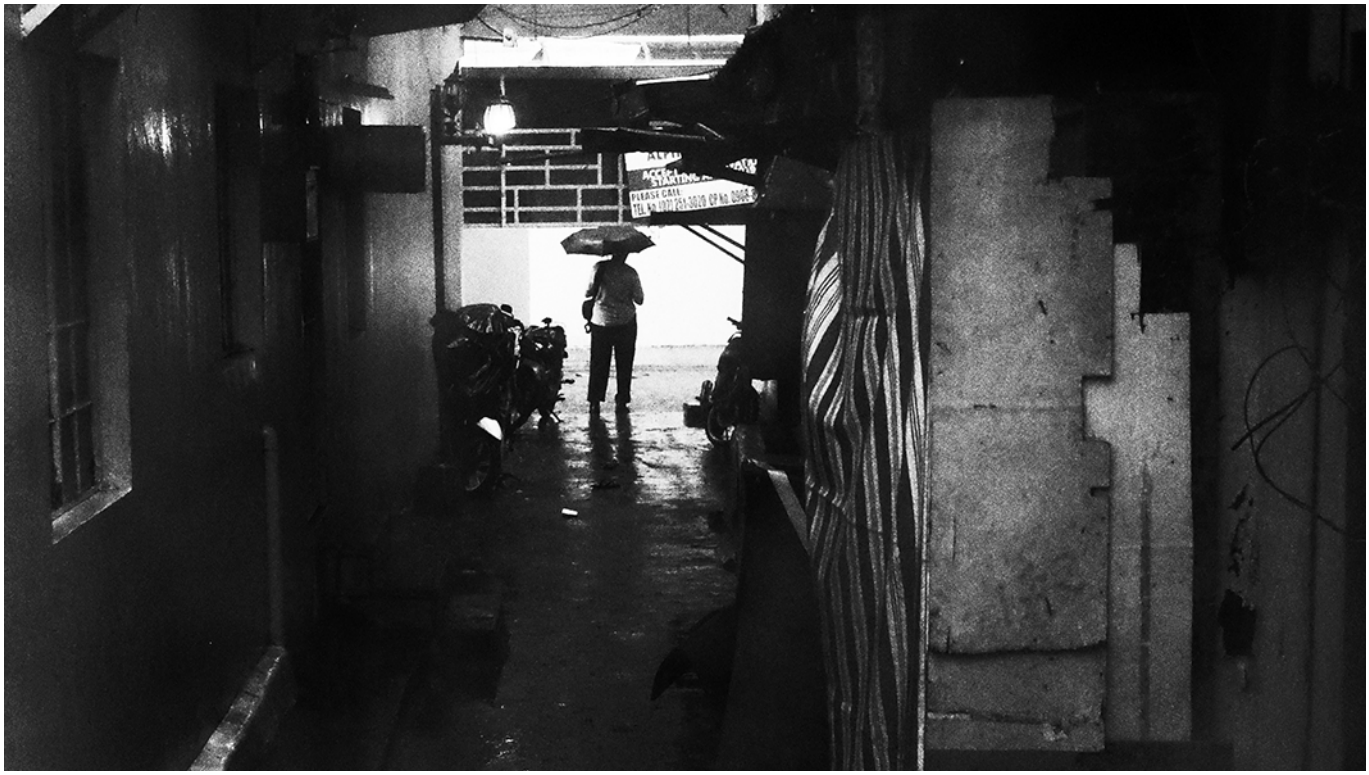
Phoebe Zoe Maria Sanchez的文章批評總統Rodrigo Duterte的威權民粹主義政權，是1986年追求民主轉型的人民力量革命失敗所延伸而成。這樣的威權民粹主義，和Marcos獨裁統治時期的法西斯主義相比，也只是換湯不換藥，甚至變得更糟了。Sanchez認為公共社會學可以藉由支持貧窮組織，和解除他們的沉默文化，來強化他們對公民社會的參與，並影響國家政策。

最後，Mario Aguja談到，相對於菲律賓北方的馬尼拉都會區在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文化力量上，皆是無庸置疑的霸權中心，南方的民答那峨島是被邊緣化的。他視這種核心—周邊關係（Center-Periphery）為問題，並以此涵蓋社會學實踐本身。在民答那峨島的議題中，不管是穆斯林與基督徒的衝突、極端貧窮比例，還是暴力極端化等等，皆是社會學可能關注的問題；然而菲律賓社會學家的論述，卻侷限在和北方霸權中心的利益相符之範圍。為了扭轉這種偏見，PSS近期作出了關鍵性的決定，將年度會議帶入民答那峨島，將民答那峨島的社會學家置於全國對話的最前線。■

來信請寄至：
Filomin C. Gutierrez <fcgutierrez@up.edu.ph>

> 菲律賓的都市研究：以社會學定錨

Louie Benedict R. Ignacio，聖多默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以及ISA教育社會學委員會(RC04)、區域及都市發展委員會(RC21)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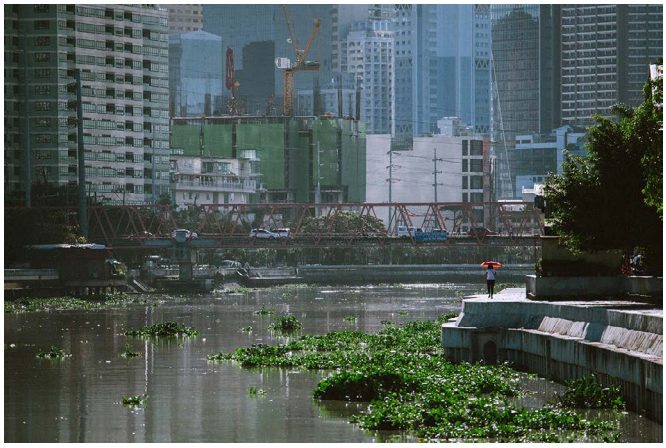
馬尼拉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都市之一，非正式移民在此處是常見的景象。
攝影：Rhon Paolo C. Velarde。

菲律賓的都市研究，尤其是都市社會學，從1980年代開始迅速成發展，當時首都馬尼拉和周邊都市都開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擴張。在社區結構化和科技進步之前，如今遍布高樓大廈、門禁社區和繁忙街道的區域曾經被綠色的田野、綿延的水流和河流系統所覆蓋。但隨著這些地區人口的增加，對社區的需求也不斷發展，導致其發展已無法依靠自身的資源來維持。這些變化顯示，針對居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需要更複雜的治理。這也引導至對都市生活的各種討論。都市生活的各個面向，包含房屋和建築環境、針對居民的經濟狀況、犯罪行為和治理的細分，都需要一個特殊的視角來理解。

政治上，為了應對這些關注，國家將其部分功能下放至各個地方政府部門，例如地方事務管理部門。在菲律賓，這個權力下放過程是由1991年《地方政府法》所賦予的。根據該法第24條，國家將其功能下放給地方政府部門，以便每個部門依據既定的國家政策、指南和標準，負責提供最小的服務和設施。根據第25條，地方政府單位應提供基本服務，例如適當的通訊和運輸設施、教育輔導服務和設施、警察和消防，以及社區發展。

在菲律賓，大都會化的概念—大都會區域和大都會治理—於1970年代初首次提出，目的是協調馬尼拉都會區附近的3個都市和13個直轄市的地鐵服務。菲律賓第一個大都會治理機構是根

>>



帕西格河延伸於馬尼拉市區。
它的水質被認為低於適宜居住的標準。
攝影：Rhon Paolo C. Velarde.

據第824號總統令成立的：1975年至1986年任職的馬尼拉都會區委員會。它的功能是協調都市服務，例如交通和運輸管理、房屋控制，以及維持清潔和綠色環境。1995年，根據第7924號共和國法案，成立了馬尼拉都會發展局（MMDA），該局對17個都市提供基本服務，並具有規劃、監督、協調、管理和整合的功能。MMDA提供的基本服務包含：交通舒緩和提升運輸效率；工作管理；污染監測；洪水和污水處理；都市更新、分區和土地使用規劃、健康和衛生；以及公共安全、救援行動。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主要特色是全面的都市化，那麼在二十一世紀，都會化就是都市治理和都市管理的最新綜合方法。都市化伴隨著貧窮的加劇，這是因為都市收入和就業機會有限，同時都市人口隨著自然成長和農村人口移入持續地增加。這也導致都市的貧民窟興起。對飲用水、衛生設施和垃圾處理的缺乏，也是快速都市化產生的問題，導致環境惡化。都市基礎設施和運輸設施的不足，形成僵局並限制了經濟成長。所有這些都市問題導致1970年代末以來都市的社會結構崩潰，在1990年代初菲律賓恢復民主時達到高峰，後果持續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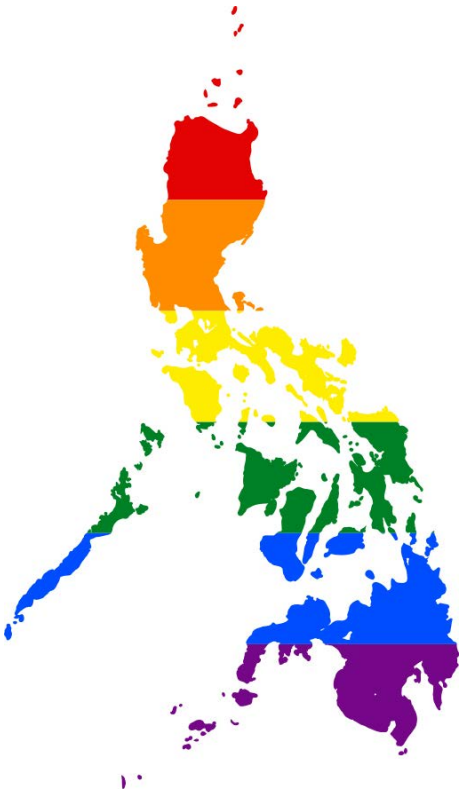
我的研究試圖一窺廣泛的都市研究領域，尤其是針對馬尼拉都會區。我首先聚焦在像馬尼拉都會發展局這樣的一個都市內國家機構，如何解決如交通管理這種都市問題，我認為在解決這個複雜的問題上，地方政府部門官員與國家機構官員之間動態的政治互動，扮演著重要角色。我繼續關注馬尼拉都會區中，市區裡的門禁社區如何形成，特別是探討門禁社區的功能如何從一種經濟安全形式演變成一種物理安全形式，並進一步發展為兩者兼具。最近，我研究了在都市環境中提供安全保障的動態關係，由於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ies）是受私人房屋組織管理的私有實體，因此為居民提供的安全性高於地方政府向公眾提供的安全性。透過新自由主義和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方法可以發現，這種現象藉由壟斷服務來源，破壞了地方政府部門的正當性，同時誘使愈來愈多上層階級的都市居民選購這種居住結構。

有鑑於馬尼拉都會區持續的人口成長——與世界其他大都市帶類似，每年穩定成長1.7%——都市地區更多元的理解變得更加重要。菲律賓的都市研究分為不同領域，例如衛生、都市計畫與設計、政治與治理、社會經濟群體之間的差異，甚至是風險與災害。對馬尼拉都會區而言，有著1280萬人口和世界上最高的人口密度之一，社會學可以提供一個總體的框架，來了解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以社會學定錨，可以連結對城市的關注和可能解決方案，這些方案由基於證據的研究和對城市的熱愛所提供。■

來信請寄至：
Louie Benedict R. Ignacio <lrignacio@ust.edu.ph>

> 利用酷兒視角導引衝突

John Andrew G. Evangelista，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以及ISA女性、性別與社會委員會(RC32)成員



酷兒眼中的菲律賓人是怎樣的?
來源:維基百科創用CC。

在其最初成為分析社會的一套框架時，酷兒理論使我們在看待與自身價值對立的事物時，即便不到歌頌，也至少能以從理解的角度出發。為了與父權體制和異性戀常規等正統觀念對話，酷兒理論將那些試圖抗拒二元性別與性的事件、時刻、認同與文化一一剖析，並嘗試尋找能顛覆現有結構的一套邏輯。在這個框架內，身為一個酷兒代表對任何類似正常的現象抱持懷疑。

人類學家Martin Manalansan藉由複雜化酷兒特質的概念，來嘗試使它具象化。這個工作不僅只是發揚具顛覆性的行為及思想。反之，這項任務是分析偏差與正常交會和衝撞的各種方式。因此，酷兒特質可以被理解為那些看似衝突的邏輯，彼此相遇的複雜空間。這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框架，協助解釋行動者面對和協調看似衝突的意義、詮釋，甚至意識形態時，內含的社會和歷史條件。

在他的著作《全球天后(2003)》中，Manalansan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是關於一個住在紐約的菲律賓籍同性戀男性，他在自己的公寓內製造了一個空間上的區隔。一側有一個帶有天主教宗教符號的祭壇，而另一側則有裸體男性的照片。西班牙殖民主義在菲律賓人身上留下的宗教遺產，流傳到了對LGBTQ族群相對較自由的城市中。這個案例不僅通過刻劃同性戀與宗教之間的複雜交會來描繪酷兒特質。它還體現了社會和歷史條件如何形塑這種複雜性。

> 陷於中間地帶

就像前述提到的複雜公寓一樣，酷兒特質研究者經常發現自己處於矛盾且衝突的空間中。他們覺得自己陷入了對立的解釋之間。在我自己關於菲律賓LGBTQ運動史的著作中，我發現自己站在運動者之間不同的意識形態張力之中。社會運動永遠不會黑白分明，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運動者經常帶有各種意識形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看待及詮釋一個主張。如此的緊張關係，正是身為一位酷兒特質研究者，如我，在面對LGBTQ運動時所遭遇的。

我同時以研究人員和活動者的身分參與菲律賓LGBTQ的活動，使自己熟悉運動各個環節之間的緊張關係。當有些人強調法律的必要性時，其他人則將性別和性解放與社會主義過渡做連結。有人將恐同和厭女視為個體意識的產物，這促使他們為性平教育爭論。最後，部分運動也意識到不同議題間的交集。因此，他們避免了只圍繞一種成因和一種解決方案的爭論。

>>

這些張力可以從酷兒視角來理解。多元的意識形態邏輯，在運動中相遇，而各種意識形態的存在為運動建立了一個混亂的形象。在馬尼拉都會區的同志遊行中，這一點尤其明顯。遊行者們抱持著各種特定意識形態下形成的主張。當一些人呼籲通過專門的反歧視法律時，一些人也提出需要改變當前的經濟體系。另一些人甚至呼籲終止勞動合約制（非典型勞動），同時企業代表正在一旁聚會和跳舞。

透過了解運動產生的社會和歷史條件，我們可以理解這種張力和混亂。LGBTQ組織是在1986年Marcos威權政府垮台後，經由幾年大型、持續地抗議，開始形成的。行動者不再全神貫注於推翻獨裁者政權的終極目標，而是開始冒險進行各種倡議。1987年憲法的制定以保障公民權利為核心價值，促進了法律組織的成立，這些組織致力於廣泛的議題，其中包括性和性別正義。

除了這次組織的機會外，菲律賓左翼也出現意識形態分裂。一方面，有人認為封建主義仍然是助長壓迫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團體偏離了這樣的解讀，因為他們發現了政治上的缺口，並利用它們爭取進步的事項。同時也出現了拒絕從純粹階級分析來看待問題的組織。處於菲律賓左翼中不同區域的LGBTQ行動者，社會化為不同的政治派系，這促進了運動中意識形態的多樣性。

> 酷兒特質的現狀

在這些競爭的聲音中，酷兒理論可能有助於在意識形態兩極分化的運動中促進對話。一些LGBTQ組織傾向拒絕和其他組織對話，特別是當它們信念不一致時。這些態度和行為很大程度來自這樣的邏輯，也就是意識形態差異是必要的、自然的、既定的。一些人甚至向我表示，由於意識形態根深蒂固，以至於它們永遠會排除對特定群體的正面看法，因此，嘗試建立橋樑的努力經常失敗。

我發現酷兒視角在這個脈絡底下是一個可行的思維框架。我沒有將政治派系直接視為矛盾，而是將它們的差異解釋為歷史產物。這種酷兒式的思考方式立基於它有能力培養對持不同意識形態行動者的同理心。需要注意，酷兒特質是一種戰略性的行動過程。我們需要從對意識形態矛盾的理解轉變為將其視為特定歷史的產物。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調配出一種有助於這個當下的意識形態，而又不會在需要其他意識形態時感到窒礙難行。■

來信請寄至：
John Andrew G. Evangelista <jgevangelista@up.edu.ph>

> 針對菲律賓毒品戰爭的不同調敘述

Filomin C. Gutierrez，菲律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以及ISA偏差行為委員會(RC29)、女性、性別與社會委員會(RC32)成員

當Rodrigo Duterte在2016年7月就職菲律賓總統時，一場針對毒品的戰爭立刻蔓延至菲律賓社會。此運動使菲律賓的國家警察哄騙吸毒者自願投降並保證停止這種習慣，Duterte上任六個月後便有超過一百萬的「毒癮人格」投降。反毒品運動通常被稱為「敲門勸導」行動（Oplan Tokhang），這是toktok和hangyo的合併詞，在宿霧語中分別表示「敲打」和「懇求」。從2016年開始，tokhang已經成為執法當局或民間反毒義警執行法外處決（extra-judicial killing，EJK）的委婉說法。

毒品戰爭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引起人權團體的批評。根據官方報告，截止至2019年7月，約有5375名毒癮人格在警察行動中被殺害。人權團體估計包括EJK在內的總死亡人數已超過25,000。國際刑事法院（ICC）在2018年2月開始針對Duterte涉及危害人類罪進行調查。社會氣象站（SWS）在2019年末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75%菲律賓人認為許多侵犯人權行為是由敲門勸導行動所導致。

毒品戰爭引起了菲律賓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極大興趣，其中多數人都對人權觀點十分敏感。官方、人權團體、包含社會研究者在內的專家，針對反非法毒品運動的道德和政治問題有諸多辯論，也體現在具爭議性的死亡人數估算、相互對立的毒品議題影響程度及嚴重性評估。

被捕者、被殺害者的寡婦，所遭遇的苦難，其敘述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暴力的菲律賓現實背景。這個現實伴隨著一個悖論：當前的政治和刑事司法體系高度汙名化毒品使用，相對地，被捕者、媒體和多數群眾卻經常使用talamak（慢性的）一詞來表達毒品的「正常擴散」。

在我的研究中，我試圖理解毒品嫌犯的不同調敘述，特別是涉及興奮劑甲基苯丙胺（當地稱為sha）的人。我訪談了27名獄中男性，大多是工人階級，且為早期和中晚期的成年人，他們在敲門勸導行動第一年被依毒品相關罪名逮捕。他們宣稱自己被錯誤逮捕，警察放置了證據，並虐待或折磨他們以使他們認罪。他們形容自己面對強行抵達他們住所的警察時所面臨的處境是walang kalaban-laban（無法防禦）。儘管他們悲慘的個人處境，許多人仍然支持Duterte的反毒品運動，因為它代表著對日益惡化、長期被忽略的毒品情況，採取決定性的行動。

很明顯地，這些「毒品犯罪者」是2016年支持Duterte總統「刑法民粹主義（penal populist）」群眾的一部分。日益增長的吸毒者和不安全的社區，所形成的道德恐慌，助長了刑法民粹主義的再起，這個術語由John Pratt提出，代表基於公眾情感而非根據經驗性證據或專家意見，而採取更嚴厲的懲罰措施。這可以從SWS在2019年底公布的民意調查中觀察到，Duterte在該調查中獲得了菲律賓人的72%淨滿意度，而對他發動毒品戰爭的淨滿意度則為70%。

在Duterte就職總統前，Gideon Lasco的研究便指出菲律賓港口社區的年輕人在非正規的工作（如攤販、搬運工、性工作者）中，使用冰毒作為pampagilas（強化工作效能藥物）。無獨有偶，我的受訪者也坦承使用冰毒來恢復體力、保持清醒，並從事難以完成或工時長且不穩定的工作（如卡車和吉普車司機、建築工人）。他們拒絕被稱為「成癮者」，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可以隨時停止，且不會讓它成為一個惡習。他們用自己的工資購買商品，而不是透過偷竊、搶劫或其他使冰毒在公共市場成為商品的犯罪行為。因此，對冰毒的使用範圍分析，必須超越娛樂、退縮主義和成癮的次文化理論等等範疇，並朝向它的功能，即作為應付貧窮和經濟不穩定等壓力的主流手段。

儘管受訪者為自己的毒品使用辯解，我與他們交談的結果卻顯示他們認知到冰毒是「家

>>

「菲律賓的毒品議題不改被簡化為好人與壞人、成癮者與未成癮者，或是好警察與壞警察之間的戰爭。」

庭破壞者」、「犯罪根源」、「終極邪惡」和「國家問題」，必須根除。他們敘述的一個關鍵面向，是被誤導的警察錯誤地逮捕了他們，而非針對那些真正有罪的人：犯下令人髮指罪行以延續其惡習的成癮者、榨取他們的貪財販運者，以及向成癮者和小販勒索金錢的腐敗警察。

我和警察針對敲門勸導的初步訪談還表明，人權團體和媒體都錯誤理解了這種經驗。他們談到了他們的信念，即保護國家及其公民免受毒品威脅的使命和理想，「似乎還沒結束」。儘管他們認知到毒品的確填補了貧困造成的真空，且毒品主在經濟上剝削了成癮者和貧困人口，但他們同時也視毒癮人格為武裝人員，隨時準備以武力進行報復。更重要的是，他們反思性地回顧了敲門勸導行動，並認為這是一次揭露「毒品問題的真相」，以及它如何「嚴重破壞警察隊伍」的運動。如果可以從「毒品犯」的視角講述一個深入故事—Arlie Hochschild用來捕捉美國右翼共和黨人經歷的一種方法—它可能會與警察敘述的菲律賓現實截然不同。

關於菲律賓毒品戰爭的社會科學研究確實有助於提供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無論這些政策涉及的研究方法是量化成癮水準、重新概念化毒品使用類型，或闡釋公眾對犯罪的看法。社會學面臨的挑戰是，必須謹慎對待二元的框架，這個框架將菲律賓的毒品問題簡化成好人與壞人、成癮者與非成癮者、好警察與壞警察之間的鬥爭。更重要的是，研究毒品戰爭的社會學家必須對刑法菁英主義（penal elitism）保持警惕，這是一個Victor Shammas使用的術語，用來指過度重視科學或專家意見，並忽視被認為是情感、非理性或簡化的公眾。這樣的自我反省要求社會學家，在面對公眾時，無論是來自社會行為者團體內部，或是政治和道德光譜上對立陣營之間的競爭敘述，社會學家都能夠坦然以對。■

來信請寄至：
Filomin C. Gutierrez <fcgutierrez@up.edu.ph>

> 使公共社會學在菲律賓發揮作用

Phoebe Zoe Maria U. Sanchez，SMAG/CriDIS、魯汶天主教大學（UC Louvain）、菲律賓大學宿霧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Cebu），以及ISA政治學委員會(RC18)成員

2018年，宗教、科學和民間社會組織的成員加入街頭抗議，反對紀念戒嚴令。

在當前的Duterte政權統治下，成堆的屍體愈來愈多（《Rappler》，2018年12月）。具體而言，該政權已開始著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解決方案，藉由一個封建政治家庭和買辦構成的網絡，在他背後提供支持並為他大膽的喉舌，還伴隨著菲律賓警察和軍事國家官僚體系。這點從Duterte如何在2018年召集菲律賓眾議院絕大多數議員並罷免首席大法官就表明了。

學者們稱其為「威權民粹主義」，部分原因是，儘管牠公開呼籲將「謀殺」作為其反犯罪政策的一種策略，但牠卻被譽為散佈著受歡迎且發展有成的計劃。然而，該政權繼承了一種政治動能，這個形式是赤裸裸的威權主義。最近，牠增加了警力、軍隊和對菲律賓社區的準軍事封鎖，同時牠通過選舉欺詐、貪污、腐敗來為其骯髒的政治扎根，並大肆屠殺，以仿照McCarthy的方式進行誘導，合理化謀殺社會運動者、宗教人士、人權倡議者、律師、教師、大學教授、農民、青年和其他人。

自從Marcos政權首次專政以來，菲律賓社會學的一項重大實踐就是採用公共社會學，作為社會學對菲律賓公眾而言形同隱形的一種必要回應。這是從以下觀點而生的，即從Marcos政權到Duterte政權，菲律賓社會正面臨永久專政的危機。它引起了人們的質疑：1986年第一次所謂的EDSA人民力量革命的本質為何？該革命雖然推翻了Marcos的獨裁統治，但它又是否真的為民主轉型鋪平了道路？不幸的是，有鑑於33年後法西斯主義秩序的建立，現在似乎已能確定，

>>

第一次EDSA人民力量革命缺少能夠真正民主化的工具。這暗示著永久威權主義的危機，並挑戰菲律賓宿霧社會學去重新思考人民力量革命以後的歲月，是真的在磨練全面民主轉型，還是在復興獨裁統治。否則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使過去的威權主義，以目前這種形式存活，並且還具備更大的殺傷力呢？因為，與Marcos的3,000多起殺人事件相比，近期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天就有33人被謀殺，也就是說，在Duterte政府執政的前三年，就有30,000多人被謀殺（《Rappler》，2018年12月）。

菲律賓大學宿霧分校所實踐的公共社會學連結了：1.專業社會學，2.批判社會學，以及3.公共政策社會學。這可以和Burawoy（2004）的公共社會學對話，它立基於社會學勞動的四個分類，分別是：1.專業社會學，2.批判社會學，3.公共社會學（數個公民社會），以及4.政策社會學。專業社會學提供了社會學技巧的機制，也就是合適的研究設計，及採用適當的研究方法和技術，例如個案分析、社會誌、民族誌、參與式觀察、基本群眾整合等。這使社會學家和學生都可以驗證他們的理論，並參與有關社會及公共政策、社會機構、文化、團體、組織之間的對話，以及參與一起工作的人們彼此間的互動過程。以同樣的方式，它邀請社會科學家重新思考社會建構主義之外的社會問題，將菲律賓的公共對話延伸至街頭，並提供機制以便記錄及公布公眾利益表達的模式。這站在原住民或地方政治的治理實踐上，批判社會學在此使人們能夠理解因某些有限資源而參與衝突的各團體，彼此之間的權力鬥爭。批判社會學可用以衡量各種結構－無論是支配者或被支配者、控制的一方或被控制的一方。它的最終目標是創造一群具批判性的菲律賓群眾，可以被動員參加實際的公共示威活動，以組織一場社會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反過來成為最後一個環節的重要動能，以政策社會學的形式評估和判斷公共政策的內容和背景脈絡。

前述論證錯綜複雜的編排方式，讓較具體的技術結合成為可能，並使公共社會學得以在科學領域發揮作用。引進公共社會學的時機，是當民主化的動力使邊緣化部門能夠獲得資源，並在公民社會和國家內部發揮重要作用時。它首先以社會學的想像中的學術練習形式，作為學生和教授之間交流的切入點。接著，它延伸到教室的四面牆之外，形成一種社會工具，並成為一種機制，用以釋放被壓迫社區之間的沉默文化，具體作法是藉由支持貧困的、匱乏的、被壓迫的和受侵害的個體及社群中的組織，來達到廣泛的討論、理論化、社交工程。社會學家具備集結一股強大力量或一群人的能力，足以揭露國家直接地、暴力地充當一個保護及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

尤其是在今天的菲律賓，公共社會學家必須有膽量做民主化進程的先驅，因為菲律賓正面臨著根深蒂固的民主匱乏及法治缺失。這次，誠如Marcos時期，菲律賓需要一個公民社會，且它的組成要是自組織的、志願的、自行產生的、真正脫離國家的、能夠闡明公共利益的、受法律秩序或一套規範所約束的。因此，公共社會學的終點可以被稱為「公共示威社會學」。這個公共示威社會學的組成包括證據、遊說工具、交易性和協作的機制、認知及理性的機器（也就是一群飽學的溝通者），以及/或是動員及競爭社會機器，並以一群公眾或投票銀行的形式出現。這種公共示威社會學衡量了正在使用的公共社會學到底多麼有效率和有成效。示威活動中的公眾是公共政策工具的一個提示，它是一個場域，用以評價及計算政府公共政策的績效或失敗。

公共社會學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總結及理論化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Lascoumes和Le Galès，2007；《美國社會學家》，2005）。從全球南方的視角來看，實質的治理是在本地邏輯或社區集體共享和團結關係的框架內所進行。這個框架接著被納入政府機構的決策、管理、稅收產生和大眾傳播之中，但要經過公民社會及其公共示威的實質公開監督。■

來信請寄至：
Phoebe Zoe Maria U. Sanchez <phoebe.sanchez@uclouvain.be>

> 在菲律賓社會學中「主流化」民答那峨島

Mario Joyo Aguja，民答那峨省立大學（Mindanao State University）、菲律賓社會學會主席，以及ISA武裝部隊及衝突解決委員會（RC01）、老年社會學委員會（RC11）、城市及區域發展社會學委員會（RC21）、藝術社會學委員會（RC37）和災害社會學委員會（RC39）成員

2019年於民答那峨島，菲律賓社會學學會會議的參與者。
來源：菲律賓社會學學會。

經常被視為菲律賓南方的民答那峨島，在充滿著邊緣化敘述的國家歷史上受到邊緣化打擊的影響最大。民答那峨島在過去由瑪京達瑙和蘇祿兩個蘇丹國所領導，且相較於全國其他地區，早在西班牙人於1521年到達以前便建立了中央集權體系及進步的文明。這些蘇丹國與西班牙殖民者在慘痛的「摩洛戰爭」中作戰了300年，沒有被殖民。美國在1898年與西班牙簽署《巴黎條約》後，民答那峨島便突然成為了菲律賓的一部分，從此被「合法殖民」至今。然而，正是美國作為一股帝國勢力，才開啟了民答那峨島全面性的殖民工作，導致其經濟、政治和文化面臨邊緣化。這種針對民答那峨島民的歷史性不義，被與主張分離主義的摩洛團體，其所經歷的艱苦鬥爭連結在一起，並解釋了當前菲律賓南方糟糕的處境。這些針對民答那峨島民的不公義作為，直到今天都是轉型正義的課題。

北方馬尼拉（後來的馬尼拉都會區）的崛起，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以及文化力量上皆是無庸置疑的核心，並在國內維繫了一個不公義的核心—周邊關係。追求南方和平、政府去中心化以朝向更自主的經濟及政治權力的努力，仍然遙遙無期。雖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民答那峨島的貧窮比例卻很高，且飽受分離主義的困擾，伴隨著穆斯林與基督徒的衝突。近期由菲律賓政府（GPH）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於2014

>>

年簽署《邦薩摩洛全面協議》(CAB)，所帶來的和平，依然伴隨著極端暴力主義的威脅，強化了民答那峨島在菲律賓國家中的邊緣地位作為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主題及對象。

> 菲律賓社會學社群的中心主義敘述

國家對於核心－周邊關係(center-periphery)的敘事使國內不同領域的努力受到困擾，包括學術、科學和專業的敘述。菲律賓社會學學會(PSS)就是這種敘述的典範。菲律賓的社會學發展主要是由大都會作為核心發動。它的成員及領導地位由來自核心的社會學家所主導。它的出版物《菲律賓社會學評論》主要收錄核心感興趣的主題和作者。它的會議大多在核心舉行。但，最近這種趨勢正在改變。

組成PSS的人大多來自核心，且所屬大學具備社會學專業課程。章程會員的名單和它們機構間的隸屬關係反映了這點。當PSS於1952年成立時，它的章程會員分別隸屬於以下機構：德拉薩大學、菲律賓女子大學、菲律賓鄉村基督徒團契、東方大學、聖靈學院、聯合神學院，以及菲律賓大學，都來自馬尼拉都會區。

於是，PSS的領導權由大都會所領導。在它69年的歷史中，它的主席有54次由馬尼拉都會區擔任，其餘7次是呂宋島，以及民答那峨島8次。維薩亞斯群島未曾取得過組織的領導權。光是菲律賓大學和馬尼拉亞典耀大學相互競爭組織的領導長達43年，而整個民答那峨島卻只領導了8年，也就是10.29%。上一次它擔任該職位是在1980年代。直到2019年和2020年，它才終於有機會領導，並將強烈的民答那峨島觀點帶入全國的社會學論述中。

> 變化中的任務

從2000年代開始，PSS在民答那峨島開始了許多行動。這是順應時代的回應，但也是因為民答那峨島人終於成為領導層的一份子。這成了一個絕佳機會，讓PSS不僅可以帶會員前往民答那峨島，還可以使它的會員熟悉民答那峨島論述作為國族敘事時的一部分。儘管有安全疑慮，2014年PSS會議還是在民答那峨島最南端的三投斯將軍市成功舉行，主題是「危機、復原力、社區：災難時代的社會學」。PSS還不滿足，再次在民答那峨島北部的伊利甘舉辦了主題為「和平與衝突的社會學：脈絡及挑戰」的2015年大會，某種程度是該組織的「轉型正義」。該主題盤點菲律賓政府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在2014年簽署《邦薩摩洛全面協定》時的承諾，以及44名菲律賓特別行動部隊成員死亡的馬馬薩帕諾衝突。隨著民粹主義和Rodrigo Duterte於2016年興起並取得權力，而他同時也是第一位來自民答那峨島的菲律賓總統，PSS便在他的城市納卯市舉行會議，主題是「想像中的民主國家：菲律賓社會中權力及知識的轉型」。2017年及2018年會議在維薩亞斯群島舉行，直到2019年回到民答那峨島的布基農省，主題為「參與的公民與身份認同」。

在民答那峨島進行的會議，給了當地提供社會學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主持的機會，並規劃他們成為國族敘事中，訓練新社會學家的的一部分。民答那峨省立大學(MSU)在三投斯將軍市主持了2014年會議，緊接著是2015年的MSU、伊利甘理工學院和2016年的達沃亞典耀大學。棉蘭老中央大學(CMU)和布基農省立大學主持了2019年的PSS大會。對從事社會學研究的民答那峨島人而言，這成為一個機會，可以利用此平台展示研究成果、發展友情，並成為PSS朝真正的國族社會學轉型過程的一部分。

今日，菲律賓社會學家對民答那峨島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民答那峨島的民眾、場所、文化淵源及論述。民答那峨島已經開始打破大都會的霸權，並將自身主流化為「另一個菲律賓」，有資格具備批判性社會學論述及領導。隨著近年在民答那峨島上的辛勞工作，菲律賓社會學學會在使菲律賓社會學成為真正的國族社會學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來信請寄至：
Mario J. Aguja <mario.aguja@msugensan.edu.ph>

> 疫情下的全球社會學

Geoffrey Pleyer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比利時, ISA副研究主席, ISA宗教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前會長 (RC47), ISA宗教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委員 (RC22), 青年社會學 (RC34), 社會運動, 集體行動與社會變遷 (RC48)

COVID-19流行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道德、政治危機，是對於全球社會學的呼告。
來源：創用CC。

冠狀病毒將科學帶回公共領域的中心，就算在民粹主義領導者曾企圖消滅科學合法性的那些國家中也是如此。流行病學家、醫生與生物學家為我們帶來確定的事實：這次的疫情每天都在進化中，比「嚴重的流感」還要嚴重。社會科學家同樣提出不容質疑的事實：儘管病毒本身可能感染我們身邊的任何人，但我們在面對它時卻極不平等。當涉及病毒的致命後果時，公共衛生政策與社會不平等跟我們身體對病毒的反應同等重要。社會科學家已經告訴我們，COVID-19大流行不僅是一場衛生危機，這也是社會、生態與政治危機。

這次的疫情造成「去全球化」的趨勢，各國關閉國界，旅行次數急劇降低，重大的國際活動（例如ISA論壇）取消或推遲。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確保「本國人」能夠獲得醫療設備與基本用品。社會科學經常沿著這條路走，並側重以國家為範疇進行的國家統計研究，分析該病毒在各國各階級與種族間不同的影響，並監督政府對危機的反應，參與全國性的公共討論。

COVID-19大流行是一種深層的全球現象，方法論民族主義捲土重來其實是一個悖論，並不僅僅是關閉國界的問題，也顯示出我們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有多深。面對疫情，國際合作至關重要。在醫學或自然科學領域，對病毒本身有更深入的瞭解、改善醫學治療並研發出疫苗是常態。社會科學領域更是如此，我們需學習其他國家、或世界其他地區的經驗。這種全球視野不應該侷限在“方法論全球主義”，也不應侷限在宏觀的分析。為能夠疫情時期發揮作用，我們應該要促進全球不同地區的社會科學家間的對話，使其融入地方、國家、區域與全球的現實處境。

儘管政治決策者時常將其排除在外，社會科學在應對Coronavirus大流行的貢獻

>>

與硬科學一樣重要，並在許多方面與硬科學互補。這幾項貢獻主要集中在四個面向的討論上。

1. 疫情是一種社會危機

社會科學家表示，儘管病毒可能感染每個人，但流行病對我們的影響都不同，而且病毒的治療方式與社會因素緊密相關。COVID-19疫情大流行加劇社會不平等現象，並顯現出社會結構的問題，尤其是在階級、種族與性別。一個交叉檢視的方法對理解如何經歷危機，以及我們面對危機的方式為什麼不平等且不公平非常重要。在沒有健康福利制度的國家或貧民窟，日益激烈的競爭如果國家與國際人道主義組織無法照常運作，衛生危機將迅速轉變成人道危機，並帶來致命的後果。

2. COVID-19的治理

第二部份的貢獻在於分析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制度應對疫情的方式。國家已經將自己作為負責處理疫情的主要行動者。國際機構如聯合國與歐盟在全球危機中則消失了。因此，這次的疫情顯現出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勢與侷限。國家政府效率低落或國家領導人嘲諷疫情並推延封鎖措施的反覆論述，導致數百人死亡。面對流行病，各國政府都設定自己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大多數國家沒能夠提供基本的保護措施，來防止病毒傳播給醫護人員。透過他們的政策，政府為某些人提供更多機會來抵抗這種病毒，而死於養老院的人卻沒有出現在大多數國家的公共統計數據中。

流行病與封鎖徹底改變公民與政府間的關係。國民向國家政府求助，期許提供對流行病的保護、照護與因應措施。許多人也因此接受國家加強的社會控制、新的監視技術與臉部識別做為控制流行病的代價。

3. 社會如何回應?

第三部份的討論針對個人與公民社會處理危機的方式。社會學家研究封鎖對人民生活、主觀性與社會關係的深遠影響，發現世代關係有了新的型態與意義。數位科技在維持社會關係發揮重要作用。然而，社會隔離措施使社會團結處在危險中，並經常縮減社區互動的範圍。雖然在社區與城市中出現新的團結網絡，但我們也看到這次疫情對封閉社群或家庭帶來團結的侷限性。

4.在危機過後，會有新世界的崛起嗎?

第四部份分析了疫情的長期影響。作為全球危機，COVID-19疫情開展了各種可能性，也是一個以不同方式重塑這個世界的機會。許多社會科學家強調，需要建立一個對人類、照護與社會不平等更加敏感的社會，並建立更強大的公共醫療體系。然而，這場危機也可能為其他社會模式鋪路。迄今為止，在管理危機方面，日益激烈的競爭戰勝新的團結。大規模經濟援助計畫的重點是拯救國家公司，而非加強公共醫療服務。流行病也可能會為新威權時代鋪路，生命政治作為新技術的基礎。

人類克服COVID-19大流行的方式將取決於醫學與科學，尤其是尋找疫苗，也端視社會、決策者與公民如何應對這場危機的方式並播下世界新希望種子。■

來信請寄至: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 COVID-19: 當前疫情的第一課

Klaus Dörre, University of Jena, 德國

這場疾病的流行狠狠地打擊了小型企業，包含餐廳與小販。
來源：Russ Loar/flickr.com.
保留部分權利。

在我撰寫本文時（2020年4月），經濟正逐漸衰退。沒有人能夠對未來幾個月的情勢發展做出精確的預測，因為還不確定流行病會持續多久。但是，經濟將預估會出現嚴重下滑，唯一的問題是衰退將有多嚴重。

> 經濟發展與其勞動力的影響

最佳的情況是多數國家的封鎖將會在一個月後就結束。然而，如德國，都需要擔心會像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出現的經濟負成長。根據ifo經濟研究院的數據，停工三個月可能導致高達20%的衰退，其中「短工時」的人數可能多達550萬人（德語為Kurzarbeit，其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不會遭解雇，但工時可能降至0小時，而政府則補償他們部分的補償。）但是，如果沒有直接的財政援助，許多中小型企業將無法長期生存。對經濟規模較小的企業來說，這將是一個特別困難的問題。對像德國這種世界出口冠軍的國家而言，流行病結束後是否會出現快速經濟成長難以確定。這將取決於其他國家（例如中國或歐洲鄰國）的恢復速度。然而，德國聯邦政府的行動是自相矛盾的：它應對歐盟內部的快速援助感興趣，但卻阻止歐元債卷作為危機管理的一種手段。

有很多事情需要擔心，因為這場危機沒有好事。它正威脅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並導致數百萬人失業，暫時性剝奪數十億人的重要基本權利。隨著流行病時間越長，對文化、社會或經濟的破壞性影響就越嚴重。因此，大小公司都適用：不要裁員，但最好是有補貼的臨時裁員。總體來說，保障就業很重要。在德國，有一些經過檢驗與嘗試的長期短工時措施。

>>

生產過程取決於合作，包含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對許多人而言，工作中的社交關係很重要。當員工間的化學反應良好，即使是對身體較嚴苛的單調工作也較能夠容忍。但現在已經消失了。「保持距離！」 基本上就是徹底的去社會化甚至去社群化。

另一方面，目前與醫院、超級市場、療養院、農業等有關係的工作都很難完全避免身體接觸。例如，人們能夠遵守規定並使用塑膠玻璃來保護店員，對那些無法在家工作的人，對於健康的風險是不成比例的大。這就是為什麼公車司機、結帳人員、護理人員與護士越來越受客戶與大眾感謝的原因。我們只能希望只能希望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並期許未來這些領域能獲得比現在更高的薪資、更多人力分擔工作與更好的工作條件。無論如何，最能夠撐過危機的國家將會是那些擁有健全醫療體系且能夠應對危機的福利國家。這也清楚顯示，歐洲大陸上哪幾個國家受此危機後果的影響最大，那就是南部與東南部那幾個國家。西班牙與義大利受武漢肺炎病毒感染者的高死亡率也與歐洲緊縮政策迫使他們削減衛生部門有關。

> 一個更脆弱的民主?

美國現在是全球Covid-19大流行的主要地方。激進右派自然是在試圖善用這種情況。各種陰謀論在網路上流傳。那群相信他們的人不僅危害自身健康的風險，更會危害他人的風險。但人們會發現，只要川普等右翼民粹主義者或波索納洛等右翼激進分子掌權，危機管理就會徹底失敗。因此，我認為，這場危機將導致右翼民粹主義者與激進分子的慘敗。

相反地，在民主進程方面存在另一個隱憂：氣候變遷可能帶來許多外部衝擊，這也需要大規模的危機管理。因為，我們需要小心，不要使緊急狀態變成常態。民主需要公開討論、辯論、示威與罷工。儘管存在著危機，但這種基本權利需要得到永久的保障。

> 必要的改變

Covid-19疫情後，這個世界與工作型態將會大不這個世界與工作型態將會大不同。近幾十年來視為毫無爭議的經濟政策教義已經被推翻：債務上限已是過時的做法。公共債務取代了過去「黑零」(black zero)政策的地位，成為平衡政府預算的主流。經濟典範也將在Covid-19疫情之後持續轉變。人們還是想知道怎麼解釋這一事實，即十年來第二次必須透過非市場經濟的方式來拯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未來不可能將此事件視為黑天鵝而不予理會。對我們所有人來說，也更加容易決定我們真正的需求是什麼。儘管沒有德甲足球比賽，我還是能夠過上完美生活。但我們離不開麵包師傅、農民、醫療人、貨車司機或樂於助人的鄰居。這顯示出我們都需要一個良好運轉的社會基礎設施。這必須成為資金充裕的公共財。如果將職業足球員Jadon Sancho與護士的月收入進行比較，就能夠清楚發現，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些事是不對的。社會服務需要在財務上進行升級，而且需要在認可範圍內進行。

關於氣候變遷造成的挑戰，危機是由災難造成的(經濟)衰退。如同2009的金融危機，當時破壞氣候的排放量與資源的耗損都減少了。由於這場危機，德國可能最終能實現自身的氣候目標。但是，這絕對與我們迫切需要的可延續性革命無關。我們現在能夠非常清楚地發現，國家在危急時期都是有自信的。國家透過強制性規定限制我們的自由來造福所有人！但如上述所言，國家行動服從民主決策。自由是有著具約束力的社會意義，這也適用在企業家的自由。未來，各種自由將需要嚴格地與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聯繫在一起。總體而言，比不開休旅車更好的就是不生產它！比不出口軍事裝備更好的就是不生產它！這兩個例子清楚表明：在危機後，我們需要對我們的經濟秩序進行根本性的辯論，而這場辯論絕不能僅由經濟學家與職業政治家進行。■

來信請寄至：
Klaus Dörre <Klaus.doerre@uni-jena.de>

> 後疫情世界的社會學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與國際社會學協會主席（2018-22）

由於COVID-19，世界以及社會學理論／分析正受到改變。
來源：創用CC。

COVID-19大流行的超現實氣氛暴露出人與人之間、國家間、公民與政府之間間的信任斷層；疫情促使我們對自己、社會關係與總體生活提出疑問。這場危機不限於公共與環境健康、或經濟。我們目睹的是晚期現代性危機與其全面的資本主義體系的真實時刻。克服這場危機後，我們依舊無法輕易恢復到「一切照舊」的狀態，社會科學應努力分析並致力解決這些新的現實狀態。

全球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學將會呈現什麼樣貌呢？在此，我想強調社會學的三項任務：建立社區到人類的多層面關注；積極應對人類世（Anthropocene）與資本世（Capitalocene）的問題；最後，為承認與道德義務設立好的議程。

> 由社區至人類的多層面關注

首先，根據疫情狀態能夠非常清處檢視各國間的實質聯繫，將全球的形象由隱喻轉為現實。但是，我們仍需要促成更多全球團結與人文主義全球化。要能夠成功做到這一點，需要將更多面向概念化。Gilles Deleuze認為，多數左派（包含多數社會科學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從較為宏觀、遙遠的角度起頭，再逐漸向內聚焦的。例如，社會不平等被理解為一種大規模的全球性剝削現象，能夠透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向內追溯。因此，多數社會科學家呼籲處理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結構，以便適當解決受影響的（抽象）社會階層的苦難。

與此相反的是認同政治運動（即伊斯蘭運動、極右派運動與保守運動），他們把關係視為由近端開始，最後發展至遙遠的地方。他們重視社區工作與家庭鄰里關係。例如，川普支持者相信川普有能力解決被遺忘的美國白人農村社會所面臨的社會不平等問題。黎巴嫩的基礎信仰組織目前是最積極主動的非政府組織，致力於解決在封鎖時期失去工作的家庭。就其他認同政治運動（圍繞在種族、性別、性取向等）而言，他們的鬥爭可能因情勢而有很大的差異，但往往以普遍主義人權的概念來支持特定社群的鬥爭。然而，對Richard Rorty而言，在推進多元文化議程的同時，這種“左派文化”為爭取社會階級正義所做的鬥爭有時非

>>

常微不足道(例如美國)。

我將Covid-19後的社會學視為一種能夠重塑社會學傳統如何掌握其研究焦點的方法(從外而內或從內而外),從而創造出多尺度焦點的方法:重新思考家庭、社區的重要性,以及愛、待客之道與照護的道德規範,然後擴大到民族國家與整個人類世界的層面。

> 在人類世/資本世中掙扎

COVID-19不僅是全球化的疾病,更是人類世的疾病。人類消費主義的教條正在消耗地球無法更新的資源,COVID-19只是這種消費主義的一個事件(儘管很重要)。眾所皆知,COVID-19是透過食用非飼養動物(如麝香貓,穿山甲和蝙蝠)傳播給人類的。他們真的好吃嗎?布迪厄認為這是與眾不同的標誌,他指出我們中下階層消費大量不必要的豪華物品。在這裡,對許多黎巴嫩人而言,放假成為出國旅行的代名詞。

法國社會學家Rigas Arvanitis將這種瘋狂的消費主義稱為「獲得幸福的神話」,認為這最終將促使更多健康問題、流行病、死亡與災難發生。如果不重新連結個人、社會與大自然,就無法檢驗這種多面向的關係。例如,要解決氣候變化與政治經濟體制,就必須提升對於人與地球之間關係的公眾意識。Jason Moore提出"資本世"的概念,作為對人類世的敏感性進行一種批判性挑釁。對他而言,資本主義正在將整個自然界組織起來:世界生態與資本累積、權力的追求與自然界的聯合生產,以連續的歷史型態結合在一起。

這種多尺度的研究取徑要求將經濟與社會重新連接,並將其與政治跟文化連接。因此,我們需要復興Karl Polanyi的社會鑲嵌概念。Polanyi介紹了三種將社會融入經濟的形式:交換、再分配與互惠。由於市場(交易場所)需要被道德化,我們的社會科學應該要認真地重新思考這三個概念,這包括對所有形式的投機活動建立牢固的社會控制。如果沒有採取重大措施來防止財富集中在每個領域的少數公司中,如果沒有對高資本額與財富建立沉重的稅收,也沒有轉向緩慢成長的經濟與相應的結果(例如,需要廉價卻低碳的公共交通,將公共服務視為投資而非債務,並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安全性,就無法進行再分配)。我將在本文的下一部份討論互惠的內容。

我們意識到,為環境而進行的鬥爭離不開我們選擇的政治經濟學,以及我們期望的經濟體制的本質,人類與自然間的關係從未像現在這樣緊密聯繫過。美國前總統雷根清楚地描述了這個快速增長的危機,他說「沒有什麼能限制我們成長,因為人類的智慧、想像力與好奇心無限」。在上一期的《Global Dialogue》中,James Galbraith與Klaus Dörre提出,增長確實存在侷限性,並描繪出一種具有意識的、緩慢增長的新經濟,他將經濟學的生物物理基礎納入其運作機制中。

> 承認與道德義務的政治

現在我來談談Polanyi社會鑲嵌有關互惠性的問題。Polanyi將其定義做為長期關係的一部份,商品或服務的相互交換,其中互惠、道德義務與關懷被增添到契約關係中。互惠建立在一種群體或網絡間相互接受彼此認同的肯認政治之上,這與多元論者與多元主義的典範相符。互惠的運作取決於社會關係中道德義務的強弱,強而有力的社會關係可以在Mark Granovetter 提出團結的網路,他認為有時牢固的網絡關係是基於禮物交換的關係。與此相關並在此基礎上擴展的是Alain Caillé的觀點,他提出反功利主義的假設,即人類渴望被視為奉獻者意味著我們的關係不僅是出於利益,而是在於享樂、道德義務與自發性。

唯有在烏托邦的存在下——即便是無法完全實現的烏托邦——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學才能在其指引下具有意義。沒有烏托邦,就不會有道德生活,傳教與社會學家烏托邦間的區隔為,後者不一定譴責他人的反烏托邦理想,甚至可能尋求相信烏托邦的人一起工作。因此,於這樣的社會學中,我們更應該理解、深化牟斯式的「禮物關係」,並更加重視社會科學與道德哲學相連結的道德義務。

這場全球危機可能已經促使人們採取新的策略來加強剝削、剝奪與新自由資本主義,並擴大我們的貪婪與自私自利,但這也使我們有機會探索並提供新的方式來理解或恢復我們的社會正義與人性。■

來信請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 孟加拉的
性別化都市空間

Lutfun Nahar Lata，澳洲，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以及ISA都市與區域發展研究委員會(RC21)成員

Sattola貧民窟的女人在貧民窟裡賣蔬菜。
來源：Lutfun Nahar Lata。

在發展最快速的巨型都市中，窮人的生存是難以受到支持的。對南方的都市而言，「非正式性(informality)」是其經濟活動中很大的一部分，其指的是一些不被制度承認的居住或勞動行為。在這些都市中，窮人的經濟來源主要為非正式部門，也因此其勞動行為時常處於法律的模糊地帶。事實上，多數的南方都市中有60～80%的工作機會都屬於非正式經濟，甚至有些高達90%。達卡作為南方巨型都市之一，也逃不過這樣的命運。除了從事服裝行業和其他低薪工作外，多數達卡的貧民窟居民都沒辦法取的正式的工作機會。現有的研究顯示，達卡大部分的政策與發展策略，皆是以房地產或是基礎開發為核心，對於居住與就業需求少有關注；這也使得窮人以非正式部門作為維持生計的主要選擇。然而這些非正式的勞動者，在為了生存而使用達卡的公共空間時，面臨了許多挑戰。

非正式性為窮人獲取收入帶來了許多限制，其中一項便是取得使用公共空間以進行商業活動的權利，就算是自己的居住地點附近也一樣。關於這類主題的研究遍及全球，並且皆指出，使用公共空間對於全球南方都市中的窮人來說，是攸關其生存的。在多數南方都市中，窮人數量呈現持續增長，即便如此，都市計畫與政策實踐中並沒有為其留下生存的空間。此外，由於城鄉人口流動，都市人口持續增長，再加上房地產的開發，土地的需求是越來越大的。因此，使用／進入公共空間的權利，將是未來巨型都市生存研究的主要挑戰之一。

在都市中的不同行動者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需求與慾望，其支配空間的權力卻也有所不同；因此，都市的空間事實上是被社會所建構。由於占用公共空間銷售產品在達卡是非法的，城市貧民經常被趕出公共空間，這侵犯了他們的生存

>>

安危，也侵犯了其對於城市的權利。另一個長期存在的議題則是空間使用的性別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女性頻繁地進入和使用都市公共空間，過去「男人在外—女人在內」的空間結構被打破，空間與性別的論述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達卡，貧窮女性參與非正式經濟，對於貧民窟家庭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一份收入通常不足以維持家庭。然而對女性來說，使用公共空間獲取收入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女性能否進入公共空間取決於社會規範、價值觀、宗教習俗以及社會和文化所決定的性別職業角色；她們進入公共空間的機會往往受到限制，因為主流的性別意識形態仍然把女性視為應該待在家中的。

多數南亞的研究以貧窮女性對家務勞動的參與為主，關於女性利用公共空間取得生存所需的研究則較少。我在達卡的Sattola貧民窟以民族誌方法進行研究，並關注使用都市公共空間以維持生存的性別面向；田野調查為期4個月，於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間，採訪共計94名非正式勞動者，包含18名女性與76名男性。我的研究結果說明了社會污名、宗教困境和父權制度的三重困境，如何使女性在透過公共空間取得收入時受到限制。

我的研究顯示，由於穆斯林的宗教常規會限制女性的衣著、行動和工作，大部分 Sattola 的女性並沒有參與任何具收入的活動。除此之外，參與於戶外的經濟活動也被視為是極端貧窮的指標。由於上述的現象，約只有3%的農村女性從事有薪工作，農村男子則有24%；女性在有償的非農業部門參與率為18%。女性的支薪勞動不如其在家務上的生殖、照顧等角色受重視。如果女性或老年女性打破這樣的性別界線，試圖出門賺錢，就會面臨性騷擾或口頭騷擾，甚至是其他類型的騷擾和暴力對待。由於他們破壞了社會規範，男人會說她們品行不端。即便她們只是在自己生活居所的一旁，進行賣東西的日常活動，多數曾經參與非正式交易活動的受訪者仍然表示，自己曾經歷過這類情況。如一位受訪者就表示：「因為我是會做生意的女人，很多人會說我壞話。雖然被這樣說，我還是要繼續經營店家來教育我的小孩。」另一個受訪者也提到：「我賣茶葉的時候，有些男人會刻意激怒我。他們有時候還會碰我的身體騷擾我。」有些女性並不會理會別人的指指點點，因為他們已經窮到沒有餘力去在意別人的眼光；如一位賣水煮蛋的受訪者所述：「不同人有不同看待事情的方式，反正我就是不在意這個。」貧窮的女性會在街上進行生意活動，時常是因為她們沒有其他謀生的選擇。舉Moyna的情況為例，由於她的丈夫生病不能工作、兒子吸毒，不能和他們住在一起，她也只得一個人經營生意；孟加拉醫學研究委員會（BMRC）的官員把她們一家人趕出了委員會附近的人行道，她才開始在達卡的Sattola貧民窟的大街上賣東西。

在研究中，我進一步指出，許多女性曾遇上嚴重的性騷擾。女性在特定區域徘徊、試圖賣出商品時，男性可能會以對待性工作者的方式對待他們。也因此，大部分女性受訪者在貧民窟外賣東西時，會由哥哥、鄰居、老公或小孩陪伴。舉例來說，在剛開始賣花時，Tahera的鄰居Noakhali便會陪著她，以防她受到其他男人的言語或行為騷擾。人們常說女性的就業和收入會賦予她們權力，但對於達卡最貧窮的女性來說，這大概只是一個神話，因為她們的（身體）安全仍然依賴於男性陪伴者。

孟加拉在2017年度全球性別落差報告中，在144個國家之間擠身於第47名。孟加拉政府以此為榮，也以改善鄉村貧窮女性的生存情況為重點，並提供她們有助於改善收入的相關培訓。至今以來，隨著女性逐漸意識到自身相較於男性處於較為次等的位置，孟加拉的政府與民間組織也開始強調女性的「戰略性別利益（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政府與民間組織也試圖藉由提供小型貸款來滿足女性的勞動參與需求，並實現「實務性別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實務性別利益」並非是推動女性解放這類長期目標的行動，而是針對女性身處特定環境、面對其社會角色時所產生需求的立即回應。改善都市女性的勞動條件，並提供其他如日托中心的設施，對於促進女性參與勞動來說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有實際行動來確保女性的人身安全，主動打造一個安全的城市。如果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無法確保女性在公共場所的人身安全，那麼至今他們為賦予女性權力而設立的所有規範與條例、所有付出的努力，都將化為泡影。■

來信請寄至：
Lutfun Nahar Lata <l.lata@uq.edu.au>

> 勞工國際主義
與資本的自由流動

Raquel Varela，里斯本新大學

攝影：Nick Bastian/flickr.com.
保留部分權利。

2016年的夏季，來自美國的汽車零件跨國供應商杜拉汽車（Dura Automotive）與克萊斯勒（Chrysler）、奧迪（Audi）和BMW等汽車製造業者締結合作關係，承諾供給這些企業汽車零組件。隨著訂單的增長，若工人們不接受在週末超時趕單，杜拉將因無法如期交貨而面臨鉅額罰金。

在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居中協調下，眾多工人為此向法院提出異議。法庭也前所未有地宣判決杜拉公司的此番操作是合法的，因為杜拉德國廠在週間是由德籍工人生產，而週末才是葡籍工人。根據訪談資料，一名葡籍工人表示，當他們抵達廠區時，可以感受到周遭緊繃的氛圍，也有部分器械早已被當地工人破壞。

> 歐洲勞動環境的重塑：位於風暴核心的移工

在當代資本社會裡，工人們被迫化身為市場上待價而沽的商品，除了得在部門間競爭，更同時也在國內、甚至國際的勞動市場競相販售自己的勞動力。討論跨國移工議題時，我們必須認知到這連結到實質薪資與工作權兩個客觀條件之上。當今的歐洲政壇，並沒有一個為跨國移工階級的利益發聲的強力政黨，使得相關議題在政策面向的討論裡往往失焦，淪為民族主義者的禁臠。若不是被極右派的種族主義與禁制主義主張給左右，便是被勞動解放運動的倡議者（自由黨、保守黨及社會民主黨）給代言，有些時候也會有被社會權的討論給分食的情形。仍未有基進的國際主義政治主張在歐洲社會討論移工議題時發揮實質影響力。歐洲各邦的移民政策還是以強制性的勞動力管理為主，而非基於人道考量或多元文化關懷。當願意為體制內的弱勢爭取權利的既得利益者與社會底層的群眾未能建立起顯著有效的社會連帶時，種族主義或排外的主張將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滋長。

全球化創造出一種全球各地的勞動階級以低工資競逐工作機會的現象，而這或許同時也形塑出作為價值對立面的國際主義得以立足的條件。如果針對卡加雷多分部工人的調度能夠為杜拉解決德國的罷工問題，那麼整個歐洲的碼頭工人也能在付出極小代價的情況下罷工，為葡萄牙的碼頭工人在與資方的角力中取得勝利。

> 為下一場跨國界罷工儲備能量

有14萬會員的國際碼頭工人連線（The International Dockers Union，簡稱IDF）二十年前在英國利物浦成立。1995年的9月29日，有500名簽訂不定期勞動契約的利物浦碼頭工人由於拒絕越過由50名非典型勞動者拉起的糾察線，而被默西碼頭港務公司（Mersey Docks and Harbour Company，簡稱MDHC）全數解雇，因而掀起一場由1995年延燒至1998年的全球性勞權爭論。

這場「利物浦大論辯」（The Liverpool dispute）可以被視為歐洲工人對抗新自由主義

>>

的首次國際主義運動，這在當時實屬罕見的創舉。也只有在這樣的緊張情勢中，勞雇關係不穩定的非典型勞動者及受聘情形相對受保障的工人群體，才有機會集結並成功動員，共同為彼此的權益發聲。同樣的策略與概念，也造就2013年安東尼歐·馬里亞諾(António Mariano)在里斯本被選為連線的領導人，他是聲援利物浦工人群體的運動中最為活躍的葡籍碼頭工人。起初，加入國際碼頭工人連線被標誌為參與國際勞工運動的起手勢，這被視為突破國際外交情勢、促成不同國家間勞工團結的機會——以國家為單位的勞工組織在國際間的合作上常無法發揮理想上的作用。因為只有有穩定辦理會議、擁有眾多在地與全球會員的國際碼頭工人有能力策動國際或區域層級的罷工行動。

在2013到2016年間，連線也發起了一連串的罷工與抗爭，力求針對過去在里斯本港工作的非典型勞工提供就業保障，並反對歐盟三巨頭(the Troika，指歐盟執委會、歐洲央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在葡萄牙財政危機期間要求下所制定、將港區人力派遣的委外統包作業市場化及自由化的法規。

2012年的8月1日，葡萄牙政府發布一條勞工法規的修正案，當中否決了勞資集體協商的法律效力，也公告將調整勞資間的法定關係，並解除任用臨時工的限制、取消任聘專業認證人力的規範、放寬工時限制、將最低時薪由1700歐元調降至550歐元，最後，也針對解聘條件予以寬限。連線的領導人相當清楚明瞭地提出對策：他們將動用正聘勞工的罷工基金資助這次修法後被解聘的非典型勞工，並遊說國際碼頭工人代表會(International Dockworkers Council，簡稱IDC)醞釀於2014年2月在歐洲各國發起罷工行動。

2014年的2月4日，在IDC的發難下，歐洲各港口開始罷工行動，使所有碼頭工人瞭解在里斯本發生的事情。在這期間，在所有響應這次行動的港口，碼頭作業全數停工，以展現國際碼頭工人的團結。這場兩小時的罷工最終為里斯本港的工人迎來曙光，葡萄牙當局承諾修法後被革職的47為非典型勞工將得以復職，部分勞工甚至得到比先前更佳的待遇。就我們所知，這次國際串聯的罷工行動以及2018年6月瑞安航空(Ryanair)於歐洲各國的罷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少數展現整個歐洲工人團結的國際行動。在其他案例中，以各國國內勞工連線為單位的國族論調則更為風行。

我認為，杜拉的抗爭行動及里斯本碼頭工人的勝利使得工會及其內部政治、權力分配的革新而言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這樣的結論並非不證自明。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歷史因素造就勞工行動在不同地方有國際主義思維與國族主義意識的分別？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將會需要深入個案來分析它們個別牽涉的條件。

> 團結起來：不只是紙上談兵

全球化創造了一種跨國生產的模式，這使得我們以從未有過的形式依賴著其他國家。19世紀時，如果一座工廠的老闆希望平息罷工，他將會僱用一些在地的武裝傭兵作為私人警力。但其實在當時，不只是平定罷工會在地方層次處理，所有涉及日常生產的種種(涵蓋原物料、工人、零組件、維修保養)，都在同個工廠的廠區內或鄰近地區完成。然而今非昔比，當代的貨輪可能由美國的大學設計，以西班牙產的鋼鐵、來自芬蘭的引擎、以及德國的漆墨塗裝，並在南韓建造。

里斯本的碼頭工人們在修法後及時領悟到這些年輕的臨時工所處的非典型勞動體制恐怕是短期內將引爆的定時炸彈，並同時意識到對集結後的勞動群體所能發揮的影響力。當今的複雜社會在全球化的浪潮裡，以一種鏈狀的型態運作。要在特定的時間點打斷這樣的供應鏈可以重創所有的生產工作。一整個國家的運作可能因而停擺，所有生產工作的命脈得以從中撼動。不只是運輸工人擁有這樣的力量。醫師、教師、公務人員及法官，都擁有同等的力量。

隨著全世界「工人自決」的聲勢不斷地提高，也凸顯了正視多元化的需求的重要性，並提醒參與者以巨觀的角度看待社會運動的整體可能態勢。資本積累的動態分析及國際市場上針對國界的策略性操作，應當使我們發展出一套真正屬於國際主義的方法論。這樣的國際主義觀點需要奠基於勞工獨立於資方的獨立結社。”Verba non sufficiunt ubi opus est factum.”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來信請寄至：
Raquel Varela <raquel_cardeira_varela@yahoo.co.uk>

> 葡萄牙面臨極右派的威脅

Elísio Estanque,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ISA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研究委員會成員 (RC47)

2012年里斯本，三駕馬車時期的示威抗議。攝影：Elísio Estanque。

Cas Mudde在其2017年《歐洲極端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指出，激進右派民粹政黨的主要鬥爭為突顯「他們的」議題，例如貪汙腐敗、移民議題與國家安全。極右派民粹主義透過否定一個人群中不同利益的存在，透過強調一個單一、本質主義的「人民」的概念，來挑戰腐敗的菁英，導向一個摩尼教式、兩極分化的政治文化觀點。他們也會動員選民來反對政治菁英，指責他們未能阻止由「他者」、「陌生人」、「黑人」、「吉普賽人」所代表的外部「威脅」。在工業勞動力下降的情況下，工人階級不再能夠主張經濟上獨特利益的承認，這可能會引發工人階級的怨恨情緒。正如 Klaus Dörre (2019) 所言，這種針對特定階級的經歷可能會成為“形成右翼民粹主義陣營的材料”。

葡萄牙迄今為止都沒有出現法西斯主義政黨或運動，在歐洲被視為罕見的案例，但這個狀況可能會改變。我指出三個重要的社會學面向，這些面向能夠解釋這種變化的本質：長期的獨裁統治歷史；1974年4月激進的民主革命；隨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存在而來的階級結構重組。

> 歷史背景

1933年整合保守主義的“Estado Novo”政權正式成立，該政權的起源能夠追溯至1926年的軍事政變，藉由1910年君主專制政權倒台，引發基層工人階級運動，是該政權主要的攻擊目標。在天主教會的掩蓋下，1920年代共和黨員、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對舊特權階級尋求報復攻擊，Salazar的道德觀念使葡萄牙在教育、文化、經濟與工業上更加落後，並懲罰、迫害、逮捕與折磨反對派長達四十年之久。儘管實行鎮壓手段與審查制度，在70年代初期還是出現一些罷工行動，該行動逐漸鞏固地下的工會組織，這主要跟葡萄牙共產黨以及與教會有聯繫的一些進步派的影響所致。此外，非洲殖民戰爭與1960

>>

年代學生在里斯本、波圖與孔布拉市的抗議活動，這兩個行動深受國外風氣的影響，增加不滿情緒（尤其是年輕人，他們是戰爭的第一批受害者），這有助於擴散希望為國內民主帶來火花。

1974年4月25日，由一群拒絕繼續戰爭並為民主與國家而戰的軍人發動軍事政變。不過，下一階段的全民動員（如罷工與佔領、意識形態辯論與更嚴重的政治分裂），正是民主得以成長的養分。即便如此，這個形塑民主與公民的過程，仍是充滿爭鬥、空想與衝突的；其中“社會主義”處在爭議核心，而拒絕“法西斯主義”是主要統合要素。反法西斯的聯合並不能夠避免共產黨人與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結構性仇恨，要一直持續至2015年，直到被稱為geringonça的聯盟出現後，雙方之間的仇恨才結束。

> 侵蝕民主

葡萄牙擁有46年的民主制度，加入歐盟35年，顯現出重大的社會與體制進步。在政治領域中，政府始終受到議會多數支持，在中偏右派(PSD and CDS)與中偏左派 (PS) 政黨之間搖擺。議會右派基本上由CDS所代表（基督教民主派所啟發的社會與民主中心）。1970年，該黨在選舉席次拿下16%（在該黨創始人Freitas do Amaral的領導下，最後幾年與社會黨進行接觸），但該黨的影響力一直在下降，目前為4.25%。

時至近日，關於薩拉查主義與仇外行為最激進的討論仍侷限在非常小的群體：PNR（全國復興黨），成立於2000年（整併了小規模的激進群體），從未超過0.2%的投票率，甚至被以暴力、仇外心態與非法擁有武器等理由向法院起訴；以及成立於2014年的新社會秩序組織（New Social Order），由PNR異議人士Mário Machado領導，其此前曾因仇外暴力被定罪。2019年8月，先前宣布為「葡萄牙最大的民族主義活動」的一場會議聚集數十人，其中包含歐洲新西斯主義政黨的代表。數百位社會運動者在舉行會議的飯店門口向此會議進行示威。

大家都知道歐盟的政治計畫對葡萄牙產生正面的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歐盟已經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與貨幣聯盟的方向屈服了。這對該國的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隨著最近的危機，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加劇，社會不穩定、貧窮與普遍工資停滯的現象持續存在（2018年的平均工資停留在為2008年的水準）。隨著中產階級與大部分勞動力的期望下降，葡萄牙的社會取而代之的是失業、沉默的怨恨。從議會選舉的棄票率的上升能夠看出這一點，從1976年的8.3%上升到2019年的51.4%。不安全感、脆弱性與恐懼導致對社會權力與機會主義領導人的崇敬知情，成為滋養右翼民粹主義發展的基礎。

> 民粹主義的威脅

因此，葡萄牙的民主生活不能倖免於民粹主義的論述。媒體對政治報導、危言聳聽的小報新聞以及電視人物廣受歡迎（部份是因為他們在娛樂或足球討論節目中系統性的播映），已經為一些政治人物帶來好處。總統德索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長達十多年的時間，他在電視上有每週一集的專屬節目，並在全國各地廣受歡迎。當今，極右派民粹主義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André Ventura正是從霸權政治光譜的核心中展露頭角（社會民主黨的前成員，隸屬於歐洲議會的自由黨the Liberals）。當他成為里斯本郊區市議會的候選人時，他主張以警察暴力打壓羅姆人社區，甚至答應對羅姆人婦女施行絕育手術，並聲稱該社區本質上就是暴力份子，以從事非法活動維生，並受益於社會政策並耗費公共資源、由全民買單，因而獲得高知名度。隨後，他離開PSD，在上次選舉中，他成立一個名為「Chega」的新政黨角逐議會選舉。他隨後以1.3%的得票率成為代表該黨參選者中唯一當選的議員。Ventura的政黨同時也爭取被視為與暴力新法西斯陣營或懷念薩拉查統治的勢力有所往來的老派政治幕僚與言論領袖的支持。

民族主義、仇外心理與反移民的論述有越發激化的現象，劍指國家的激進、道德式言辭一再打擊議會的民主原則及尊嚴。「Chega」以游擊方式大打口水戰，並採取對政治菁英持續迫害的姿態，除了因為出現在議會而增加媒體的報導，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6%民眾有意投給該黨（Expresso / SIC民調，2020年2月14日）。這正是值得擔心的跡象，我們不該再將葡萄牙政壇視為新法西斯政黨崛起的例外。

來信請寄至：
Elísio Estanque <elisio.estanque@gmail.com>